

2007 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許雪姬**

摘要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成立於 2004 年，自 2005 年起，每年出版一本前年度的《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旨在結合出版資訊的時效性及文獻書目的完整性，進而建立兼具累積性和學術性的學術批評傳統。

本文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召開的「2007 年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為主，探討 2007 年臺灣史研究的趨勢。本文先以四大類（總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簡介 2007 年研究成果，再針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綜合討論，最後提出展望未來的視角。

雖然臺灣史研究呈現多元的發展，但仍有待建立對於當代史學思潮與研究取向的基本認識，並從比較的歷史的視野，反省臺灣史研究現有成果及未來方向。進而展現其學術獨立與專業並重的歷史敘事與思維方式，這將是臺灣史學未來能否茁壯發展的重要關鍵。

關鍵字：臺灣史、史料、人物傳記、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回顧、展望

* 本文之完成得力於參加此次會議的所有撰稿人，引用之處不再特別加註。又本文之完成得王美雪、余昌蓬兩人協助，謹致謝意。本文因篇幅有限，文中所提論文、專書，僅書寫作者姓名，無法再將所有的書目、篇名一一列出，請參考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編輯小組編輯，《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07 年度》（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及《「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會議論文集》（「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合辦，2008 年 12 月 4 日，未刊稿）。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來稿日期：2009 年 6 月 5 日；刊登日期：2009 年 7 月 7 日。

- 一、前言
 - 二、2007 年研究成果簡介
 - 三、研究成果的評論
 - 四、對未來研究的期望
 - 五、結論
-

一、前言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臺史所)成立於 2004 年,自 2005 年起,每年出版一本前年度的《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旨在結合出版資訊的時效性及文獻書目的完整性,進而建立兼具累積性和學術性的學術批評傳統。《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07 年度》(以下簡稱《文獻類目》)的編製,雖然未能吸納較地方性的刊物,¹ 在區域史方面的選樣亦有所不足,但大體尚能蒐羅過去一年來臺灣史方面的論文目錄,² 2008 年起乃利用此一《文獻類目》分成四大項:總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由中研院臺史所、³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政大臺史所)、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師大臺

¹ 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編輯小組編輯,《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07 年度》(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在臺灣 21 縣市 2 直轄市、金門、馬祖中,只收《臺北文獻》、《臺東文獻》、《臺灣文獻》、《高市文獻》、《臺南文化》,而未收錄其他縣市的類似出版品;另對地方學研討會論文集也未收入,亦將水準不齊的部分碩專班論文排除在外。

² 對史學界較陌生的領域,如生死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社會科教育、經營管理、空間設計、應用語言、行政管理學等領域的期刊、學報較少注意,但已盡量收集與臺灣史有關的目錄。

³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負責總類和經濟類,分別由張隆志、林玉茹主稿。而總類部分,再分請莊樹華(總督府檔案)、王麒銘(資料彙編)、賴志彰(空間及圖像)、許毓良(方志),侯坤宏、鄭麗榕(口述歷史);經濟類則為李為楨(經濟政策與發展)、何鳳嬌(土地史)、張素玠(移民史)、陳鴻圖(水利史)、蔡龍保(交通史),高淑媛、謝美娥、曾品滄(產業史)、洪紹洋(工業史)等人執筆。

⁴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負責政治類,分由鍾淑敏、陳翠蓮、薛化元,分別就統治制度與帝國政策,從抵抗權力到解構權力,外交、臺灣國際法律地位及法律史三方面做回顧與展望。

史所)，⁵ 共同召開「2007 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分別針對 2007 年的研究做評介，並提出對該領域的期望。由於是第一次辦理，因此先僅就在臺灣出版的臺灣史研究專書、論文做評介，有關中國、日本甚至歐美的臺灣研究則有待下一年度辦理。

過去有關臺灣史研究的相關評介，早年有《思與言》雜誌、⁶ 而後李筱峰、施志汶、吳文星等人，就博碩士論文中臺灣史研究的相關論文做評介；⁷ 2004 年林玉茹等人有《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第七冊）》一書出版，⁸ 彭明輝也針對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中對中國史、臺灣史、外國史研究的趨勢、佔有的比例做過統計和分析，⁹ 凡此種種都有益於了解臺灣史研究的現況、優缺點。本文先簡介 2007 年研究成果，再加以評論，並對未來提出看法。

二、2007 年研究成果簡介

有關本年的研究成果，分成四大類，每一類之下再分成不同的專史，逐一探

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負責社會文化類，有關教育、體育休閒、宗教、媒體傳播類，由吳文星、蔡錦堂主稿。分由謝明如、林玫君、盧啟明、陳佳宏、劉彥君協助撰稿；有關家族、建築、區域、醫療、原住民，則分別由張素玢、蔡淵聚、黃士娟、吳進喜、范燕秋、詹素娟撰稿，張素玢主稿；臺灣文學、音樂、戲曲、美術、女性議題分別由黃美娥、陳建忠、連憲升、謝世英、楊翠撰稿，再由黃美娥主稿。

⁶ 如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思與言》23: 1 (1985 年 5 月)，頁 3-17；黃富三，〈清代臺灣土地開發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思與言》23: 1 (1985 年 5 月)，頁 18-24；許雪姬，〈清代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制度史為例〉，《思與言》23: 1 (1985 年 5 月)，頁 25-36；黃秀政，〈臺灣武裝抗日運動：研究與史料〉，《思與言》23: 1 (1985 年 5 月)，頁 37-59；張炎憲，〈日據時代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思與言》23: 1 (1985 年 5 月)，頁 61-70；蔡淵聚，〈光復後臺灣地區有關清代臺灣社會史研究的檢討〉，《思與言》23: 1 (1985 年 5 月)，頁 71-92；石萬壽，〈臺灣南部平埔族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思與言》23: 1 (1985 年 5 月)，頁 93-107。

⁷ 李筱峰，〈近三十年來臺灣地區大學歷史研究所中有關臺灣史研究成果之分析〉，《臺灣風物》34: 2 (1984 年 6 月)，頁 84-97；施志汶，〈「臺灣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國內各校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為中心 (1983-1992)〉，《臺灣師大歷史學報》22 (1994 年 6 月)，頁 413-446；施志汶，〈近十年歷史研究所臺灣史碩士論文之考察 (1993-2002)〉，《臺灣史料研究》21 (2003 年 9 月)，頁 54-87；吳文星，〈近五十年來關於日治時期之歷史研究與人才培育 (1945-2000)：以歷史研究所為中心〉，《臺灣史研究》8: 1 (2001 年 6 月)，頁 169-171。

⁸ 林玉茹、李毓中著，收於高明士主編，《戰後臺灣學研究：1945-2000》(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第七冊。

⁹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取向：一個計量史學的分析 (1945-2000)〉，收於同氏著，《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 151-202。

討。由於 2008 年召開「2007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中已有 8 篇相關論文發表，本文乃在上述基礎上撰寫，將不再鉅細靡遺陳述篇名、內容，僅著重於相關成果的簡介。

(一)總類：臺灣史通論及史料研究成果簡介

大抵可分為臺灣通史專書及研究回顧論文、史料等三大類。在臺灣通史方面除有 Murray A. Rubinstein 編輯、擴充的 *Taiwan: A New History*、周婉窈日文版的《*図話台湾の歴史*》外，有三本著作，戴寶村《簡明臺灣史》（另有中英對譯的版本），希望重新建立由臺灣及臺灣人為主體的史觀；戚嘉林、宋光宇兩人的《臺灣史》則不約而同地批判以臺灣人為主體的史觀，前者在序即強烈批判「虛構的臺獨史觀」，後者則闢專章討論「臺灣史史觀」，強力批判臺灣中心論、同心圓理論以及去中國化政策。兩種極端不同立場書寫的臺灣史，也只有在民主國家的臺灣才可以並存。

在回顧論文方面，一是《史學雜誌》照例對 2006 年的日本史學界的臺灣研究做回顧與展望，由三澤真惠美執筆；金丸裕一則以社會經濟史為例談日本臺灣史研究與教育概況，指出研究臺灣史之先要先打好日本史的基礎與訓練，提倡應加強清代及戰後臺灣史研究，日、臺雙方的交流；張勝彥則檢討臺灣戰後各大學歷史系所有有關臺灣史研究的課程，指出 1980 年代以前臺灣史大半是選修，到 1990 年代後期則成為必修，歷史所在 1980 年代將臺灣史研究納入專修課目。

在史料方面，共有 125 筆，可見 2007 年有關史料的編輯、出版上有不錯的成績展現。可分成五個種類來討論，首先是研究日治時期不可或缺的臺灣總督府檔案，由檜山幸夫教授所主導的《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已出完明治時期永久保存目錄的整編工作，共 24 冊，編輯仔細，若能放入〈臺灣總督府檔案資料庫〉中，必有益於檢索與利用。小梅庄的公文書屬總督府地方性公文，李若文除解釋其主要用語外，也就地方自治行政、文書管理制度、文書學來探討該公文書。黃淑惠則對臺灣總督府檔案編排與描述進行研究，指出臺灣文獻館自行創造 12 個分類時期的系列層級，未就檔案本身所具備之條理進行層級區分；也指責中央研究院團隊在整編該批檔案時任意合冊、拆冊、混亂檔案的原始秩序。

在資料彙編部分，包含江樹生翻譯司令官雷爾松、長官宋克、韋特寫給 VOC

的信，稱荷蘭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李毓中等人則翻譯 1632 年 Diego Aduarte 修士所寫的「艾爾摩沙島事務報告」。荷、西文獻與早期臺灣史關係密切，若能投注各方心力於翻譯工作，必有更多的臺灣早期史研究的論文出現。日治時期日記資料的刊刻也是平衡臺灣總督府檔案、官方說法最有效的資料，本年繼續出版《灌園先生日記》（1941-1942 年），以及《楊基振日記》，以「準半山」¹⁰ 角色對戰後臺灣的觀察提供了極佳的案例。李東華編的《羅宗洛校長與臺大相關史料集》，其中有羅氏 1945 年 10 月至 1946 年 6 月的日記，是了解此一時期高等教育的寶貴資料。

臺灣史日文史料的出版，亦值得重視，如阿部洋等編《日本殖民地教育政策史料集成》（預計出 110 冊，附有解說）、重刊《愛國婦人会台灣本部沿革誌》（1941 年初版），以及蘇瑤崇編的《臺灣終戰事務處理資料集》，是了解殖民統治解體過程中的重要資料。至於通論史料則有《全臺文》，共 42 冊，但在選取範圍標準不夠明確，且與過去的出版品有重複之處，尤其自《臺灣日日新報》選出的文章，亦與編者立意搜羅的「傳統文學」有出入。至於李祖基所編的《「二·二八」事件報刊資料彙編》，則為中國廈門大學圖書館度藏的剪報資料，筆者也曾看過這批資料，這對了解中國各大報對二二八事件的看法有所幫助。

做為收藏戰後資料最多的國史館，繼續出版了《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第五冊》、《戰後遣送旅外僑回國史料彙編》。收藏清史檔案出名的故宮博物館也出版《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專案檔暨方略叢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另一個國家機關行政院衛生署和檔案局則合作出版《公共衛生風華雲湧：百件衛生重要檔案選輯》。

在空間與圖像上，主要有《珍藏灣裡街百年影像：20 世紀善化影像》，以人物合照為主，搜集 1903-1990 年代的照片，雖沒有分類，仍然有參考的價值。至於國家圖書館出版《日治時期的臺北》、《日治時期的臺南》，則對上百張以上照片、明信片進行分類，並有簡單的解說；至於《地圖臺灣：四百年來相關臺灣地圖》，則將所能見到不同類型、不同畫法的臺灣圖冶為一爐，使此地圖集有些凌亂，但還是有其臺灣地圖發展史的貢獻。

¹⁰ 所謂半山是指日治時期到中國（唐山），特別是國民政府轄下的臺灣人，戰後被稱半山。準半山亦有中國經驗，但是卻在「淪陷區」活動，嚴格說來不算半山，但趨近半山，筆者稱之為「準半山」。

方志類分成舊志點檢重刊和新方志修纂兩部分。舊志再刊是 2003 年以降，文建會「臺灣史料集成」大計劃下的產物，本年共有 14 本重刊，¹¹ 新編方志有二：臺東縣《鹿野鄉志》、南投縣《水里鄉志》。至於方志文獻的討論，則有周宗賢以淡水為研究中心的《淡水：輝煌的歲月》，以及曾鼎甲對《臺灣省通志稿》中的革命、學藝、人物志的研究，另外李昭容與李巧雯分別將《臺灣省通志稿》、《臺灣省通志》拿來比較，著重藝術篇和人口篇（人民志）；王靜儀則以《臺北縣志·自治志》與《臺中縣志·自治篇》進行分析比較，亦有對戰後鄉鎮志的分期評介。鄭喜夫對已故謝浩（1925-2004）有關清代臺灣方志的研究加以肯定，但謝浩認為蔣毓英《臺灣府志》是得自鄭氏的成果，此一說尚未能進一步證實。

林開世以《噶瑪蘭廳志》為例，找出方志中潛藏的帝國秩序與正統觀，指出官方無視新領地文化上的差距，並點出可以從地方志的編纂，製造出可全面性掌握的知識，立論非常精闢。楊護源對於《臺灣府志》的六個版本與其體例、綱目的探討，陳維英《偷閒錄》以「曉綠抄本」內容最佳，這些研究，有助於學者注意版本學。

口述歷史是方興未艾的史料採集（也是創造歷史）手法，2007 年在這方面可謂豐收。有 4 本國軍（陸、海、空）眷村口述歷史系列，較為突出，國史館有關佛教人物訪談的成果有 2 本，一是恒清法師的個人專訪，和 12 位佛教人物的合集。至於基督教人物則有老書新譯的《馬偕回憶錄》及再版的《蘭大弼醫師回憶錄》。政治、學術、軍事人物的口述訪談數量也不遑多讓，本年有楊青矗、高玉樹、魯肇忠、盧千惠（前駐日代表許世楷夫人）、賴永祥、黃崑巖；另有臺灣文學家的訪談，由作家藉著接受訪談回顧其創作的啟發與歷程，由莊紫容主導，是口述歷史的一個新方向。此外，臺北市文獻會針對社會事業、婚紗業、相機業進行座談，所取得的資料彌足珍貴。本年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行第 11 屆全國口述歷史工作會議，以口述史歷史週的型態呈現，其特色為對臺灣大學院校中「口述歷史教學」的座談，以及與日本、中國的口述歷史界做經驗的交流，該所也製編了《臺灣口述歷史書目彙編（1953-2009）》，預計在 2009 年 8 月出版。

¹¹ 《續修臺灣府志》（上、中、下），《續修臺灣縣志》（上、下），《臺灣採訪冊》，《清一統志臺灣府》，《澎湖續編》，《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上、中、下），《恆春縣志》，《鳳山縣採訪冊》（上、下）。參考自許毓良，「表一：2007 年清代臺灣方志彙刊出版書目」（未刊稿）。

(二)經濟史成果簡介

經濟史的範圍大，可分為八個區塊來觀察：

1.經濟政策與發展

這偏重在戰後經濟政策、專賣制度以及物價等問題的探討。翁嘉禧全面檢討戰後初期相關經濟政策，指出其缺乏整體性與一貫性，導致效益不大，甚至引發二二八事件。吳聰敏說明戰後惡性物價膨脹的原因，以及美援在物價穩定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張清溪說明「黨國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歷史過程，以及對臺灣經濟結構與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瞿宛文則主張戰後臺灣的經濟是由黨國扶植私人資本進而互相結合的過程，稱之為「官商資本主義」，她另從「日本殖民統治是否帶來臺灣戰後工業化」的命題切入，指出過去研究鮮少討論決策者的目的與意圖；且分析上有結構決定論的傾向，因而未能處理主觀或文化因素的作用，因此諸多論述仍有爭議。范雅鈞研究戰後的專賣制度，指出戰後初期專賣局生產業務均處於克難增產階段，一直到 1958 年才得以增添設備、開發新產品、展開新階段。

2.土地開發史

這包括地權、土地開發、租佃、放領、改革、市街發展等課題。李文良指出強大如岸裡社，且有政府依據法律准許其開墾土地的背景來加以背書，但在維持地權上，還需要透過一些文化建構來強化其地權及土地控制的合法性基礎。有關地區開發史，仍是研究的主軸之一，尤其是學位論文，本年度共有 6 篇，研究的地區包括濁水溪中游、牛欄河流域、清水地區、日月潭地區、宜蘭溪南地區及南臺灣的山區。就研究區域而言，中部地區最受矚目，就時代來說清代最被青睞。有關日治時期土地地權的討論有 2 篇，一是張怡敏探討霧峰林家頂厝林澄堂系，長達二、三十年取得緣故關係地所有權的過程；劉淑玲指出總督府放領土地給日籍退職官員的最終目標是促使退職官員在臺定居，深入臺灣農村，以發揮「內臺融合」及「同化」的功用，其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何鳳嬌探討戰後國府接收土地時，產生種種糾紛，甚至個人私有土地被收為公有。這些臺灣人私有土地與接收自日本人的龐大公有地，成為日後政府實施土地改革的土地來源。葉淑貞的研究，指出日治時期的租佃制度在租期的安排上符合效率的原則，並不像戰後政

府所言，日治以來的租佃制度是土地制度的萬惡淵藪。劉瑞華則從財政面著手，指出政府最初撤退到臺灣時，先實施三七五減租，作為贏取廣大農村政治支持和推行加稅的權宜策略。之後，當韓戰帶來美援紓解財政需求後，政府開始著手改進農村制度，並利用土地改革增加長期收入，而成功地抗拒了地主對政治的影響及取代其在農村裡的角色。余美滿的碩士論文則針對戰後臺灣土地改革政策做政經分析。

3. 移民史

主要集中在日治時期，有 2 篇以日本移民為中心，張素玢指出位於下淡水溪浮復地的日本移民村，由於總督府的輔導，加上菸草的契作性質，保障了菸草的產值與產量，使其成為全臺移民村經濟狀況最佳之地，更是臺灣最重要的菸產區。陳鴻圖指出貧窮的農業經濟和侷限的農業環境，是導致臺東廳私營移民失敗的主要原因。張靜宜探討 1938 年起，在臺灣總督府的規劃下，派遣農業人才，將臺灣熱帶栽培經驗移植到中國華南、東南亞日軍佔領地，協助軍方發展各地農業，以支援各項軍需作物的增產。廖經廷比較日治和戰後移民至鳳林地區客家人的遷移模式，並從職業、客家意象、社團活動以及原鄉聯繫等四方面分析其在地化過程的異同。

4. 水利史

主要以日治時期為多。治水是近年來水利史新興的課題。馬鉅強以《灌園先生日記》為中心，探討日治時期烏溪治水工程及林獻堂所扮演的角色。劉素芬分析霧峰林家在林獻堂的領導下，配合祭祀公業雄厚的經濟基礎，在水利事業上和國家展開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陳鴻圖觀察嘉南農田水利會組織的變遷過程，指出其變遷的原動力在於水功能的逐漸轉變，不論民間或政府都急欲掌握水資源，而導致水利組織為求生存不斷在政府和農民間斡旋，甚至被強迫轉型。黃繁光從長時期觀察霧峰地區的水圳系統和農作發展的關係，由於戰後霧峰發達的水利系統和南投水利會的經營管理下，促使本區農業高度發展，「霧峰香米」乃應運而生。清代水圳的興築，陳哲三認為官方對於水利設施採取消極態度，但卻鼓勵民間興建的態度。

5. 交通史

本年度研究成果豐碩，舉凡鐵路、輕便鐵路、道路、航運、郵政等方面，都有人從事研究。研究從業人員和技術官僚的角色，有蔡龍保和吳政憲。蔡龍保解析戰後政府接收鐵路困難的原因在於臺籍職員具鐵路專業知識者甚少，加上殖民地技術轉移不良所致。吳政憲究明電話接線生這門新職業的發展，及其在 1920 年代末期遭遇自動交換機衝擊後之應變。輕便鐵路、運輸倉庫業、道路事業的相關研究，是 2007 年較新的課題。蔡龍保以桃坎輕便鐵道會社為例的個案研究，說明日治時期臺灣人勇於挑戰新產業、其資本的存續與發展，以及地方領導階層由士紳、地主、資產家轉為企業家的現象。陳家豪則以桃園輕鐵為例，觀察臺人企業在日治時期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經營實況以及在社會經濟上的角色。王珊珊以日治時期的「小運送業」為對象，究明其發展過程、「運送業組合」以及臺灣倉庫株式會社與統治者之關係。蔡龍保探討臺灣近代道路的鋪設，指出臺灣近代道路的鋪設乃配合汽車運輸業之需求，為總督府鐵路、港灣、汽車運輸的交通整合政策奠定初步的基礎。有關日治時期臺灣電力與工業化問題，吳政憲就市場、發電量、工業化等面向，發表其博士論文的研究成果，說明日月潭水力發電完成前後臺灣的電力供給問題，並指出在日月潭水力發電完成後，臺灣低廉電價對資本家的吸引力已落後於朝鮮、中國東北，因而對內、外均造成臺灣工業化之侷限和阻礙。

6. 產業史

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包括農、漁業、物產、報業、觀光業以及產業組織等主題。早期農業史的研究，曾品滄以農業生態學的觀點，重新檢視早期臺灣農業的發展經驗，指出明鄭時期以漢人小農生產模式，比起荷人以貿易利益為標的而招徠漢人從事計劃性的農業墾殖活動，更容易獲得成功；陳立人指出荷蘭時期漢佃與漢人墾主之間的租佃關係，係依照原鄉的傳統習慣而成，漢佃的田租負擔為每甲約 14 石。清代產業史研究以食鹽為主，陳鳳虹說明臺灣鹽埕的變化以及食鹽生產的方式；顏義芳、方俊育對戰後鹽的發展和「鹽賊」現象有所著墨。不過，上述研究皆未好好利用數量龐大、完整的鹽業檔案。其他產業的研究有洪麗

雯對臺灣蓮草業的研究，她指出清代透過蓮草畫的形式及原料外銷，將臺灣蓮草推展到世界舞臺；劉書彥研究新渡戶稻照影響下的臺灣糖業政策；陳思萍研究山茶工場；黃馨儀研究紅茶文化。至於戰後臺灣農業的研究，以曾鼎甲的研究較值得注意，他討論戰後臺中縣的農業發展歷經復甦、穩定成長、衰退的變動過程，本書屬總體與個體對照的計量史學研究，值得肯定。新聞業和觀光業也有新成果。許旭輝探討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新報》的過程與意義。吳靜怡則以交通與旅館為例，探討日治時期高雄市觀光業的發展。日治時期水產組織的討論，為產業史的新課題，謝佳珍分析日治時期臺灣水產協會的成立背景及其幹部組成、合併水產協會的過程以及臺灣水產會和水產協會的差異。

7. 工業科技史

主要涵蓋礦業、農產加工、造船、金屬、機械等各項產業，以造船業的表現較為突出。礦業史方面，由黃俊銘等完成一篇討論清代苗栗石油礦開採史的專文。高淑媛由經濟政策與產業發展的角度，觀察日治時期殖民政策與鳳梨罐頭業發展之間的關係。臺灣造船業史是近幾年來新興的課題，蕭明禮概述日治時期臺灣造船業的形成與發展。洪紹洋以承繼臺灣船渠會社的臺灣造船公司為研究焦點，釐清了日治時期的臺灣船渠株式會社於戰後先後轉為臺灣機械造船公司和臺灣造船公司的過程，並說明日治時期日本人持有的股票與民股，戰後如何整編為國省合營的臺灣機械造船公司的資產；又探討 1960 年代臺灣造船公司如何藉由引進日本技術，並運用「後發利益」學習模式，最後終於擁有建造大型船舶能力的經過。吳初雄介紹日治時期至近年高雄旗津地區造船業的發展。陳慈玉進行臺灣鋁業的研究，指出戰後初期臺灣鋁業公司的復元，在 1950 年代前後兩次與美國資本合作計畫卻均告失敗，並與同時期日本鋁業的復興進行比較，指出日本雖然也有資金和設備的問題，但在順利引進加拿大鋁公司技術後，即為日本鋁業的發展奠定基礎。塑膠產業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吳若予主要討論臺灣石化工業的先驅臺灣聚合公司與 1972 年退輔會塑膠工廠成立之間的關係。國立科學工藝館近年來展開「臺灣產業史」研究系列，出版臺灣自行車產業發展史、臺灣製鞋產業發展史、臺灣電腦產業發展史，均有值得參考之處。在企業經營方面，趙祐志以日治時期在臺日本企業繼承的親屬關係為焦點。

8. 貿易史

清代的郊仍是研究的重心，戰後相關研究則付之闕如。王淑津、劉益昌利用考古資料與西、荷文翻譯史料，論證十七世紀前後，臺灣因處於貿易要道上，外來的物質文化取代了以玉器為主的飾品與儀式用品體系，而煙斗、喫煙習俗也隨著荷人和西班牙人統治臺灣，成為原住民日常生活的消費用品。陳宏維則關注荷治時期漢人的投資活動，該文指出荷治末期臺灣西部漢人的投資活動有朝大資本投資，且海外貿易與內地經營連結強化的趨勢。郊向來是清代臺灣貿易史研究的焦點，林玉茹以鹿港泉郊許家為例，指出郊商如何控制進出口貨品，如何投資，以及泉州、鹿港郊商間形成的互相信賴的共利結構。沈昱廷利用吳家的帳冊和地契文書，指出資生行採用蔭股和身股方式分配和照顧同宗族人，是較新的論點，並更清楚地展現笨港本地郊行的盈虧、在集貨和銷售體系中的角色。卓克華將《清代臺灣的商戰集團》，重新整編成《清代臺灣行郊研究》，可說是卓氏行郊研究的完整版。

（三）政治類的成果

評論的重點包括日治時期統治制度與帝國政策，由抵抗權力到解構權力，外交、臺灣國際法律地位及法律史三個大項目。以下逐一討論。

1. 統治制度與帝國政策：

在荷蘭時代有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鄭維中譯的《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以亞洲視角講述荷治時期臺灣的史事，並將臺灣當成已經歷經全球化洗禮的縮影來呈現。本書在於解決一個南島民族聚落的島嶼，不到百年間成為大清帝國版圖的一個府，是怎樣的轉變造成的。他解釋荷人未使臺灣成為紐、澳，而是由唐人建殖民地，主要是「共構殖民（co-colonization）系統」，即 VOC 提供安全保護、制度規範，而漢人提供勞力、繳納稅金，但原住民則陷入貧困化的窘境。

在清代方面，李文良探討清初入籍臺灣法規之政治過程及其歷史意義。他以新的角度切入，探討在臺灣政治重建過程中，漳浦集團與治臺政策的連帶關係。

石弘毅的碩論探討康熙年間治臺政策的內涵，並就高中低階層官員的治臺思想內容與施政措施的影響面加以說明。黃曉玲分析晚清治臺政策演變與臺灣政經社會發展間的互動，指出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儒家文化在臺灣更具資本主義色彩，為日本往後殖民、治理臺灣奠下基礎。林秀珍透過《淡新檔案》中淡屬暖暖公所興建的相關文件，對清代臺灣公廨建築營建程序進行分析，從而了解由官府主導的建築，其實際運作的狀況。柯蘭由蔡牽對臺灣的襲擊事件，探討清代在臺灣的防務狀況，以及各種弊端。

日治時期的研究成果有 4 本專書，分別是林玉茹、張靜宜、陳鸞鳳、林修澈等人的著作。¹² 產業型態和學術研究是否和國家政策緊緊相連？張靜宜探討日治末期臺灣主要的特用作物增產過程及栽種經驗移植內容，建構日治末期產業發展及臺灣總督府能順利推動各種獎勵作物增產的關鍵，進而討論國家政策是否真能改變臺灣原有的產業型態。范燕秋、葉碧苓則以臺北帝大來觀察戰爭時期帝大為配合政策而動員，並藉此擴張其研究領域與版圖；後者則說明帝大南方研究配合日本南進政策的情形；王學新則由另一個角度探討黑幫臺灣籍民在廈門的形成與發展，另文則探討 1895-1937 年南進政策下的籍民教育。

日本在臺的統治結構與帝國構造問題，是研究日治臺灣史的基礎工程，蔡慧玉長年致力於官僚養成、任命等相關研究，她從文官高等行政科及格者的統計資料著手，比較臺、朝兩大殖民地高等官的派任，從而檢視行政科高考及格的臺灣人在日本帝國任「高等官」的情況；她並分析臺灣基層行政的考試任用和其他用人途徑，企圖檢證山室信一所提的「統治人才的周流」等概念。此外，她由俸給法令的文書和職官制度演變的角度切入，來檢視日治臺灣的行政體系，從而分析「殖民地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 和「殖民遺緒」(colonial legacy) 這兩個抽象的問題意識，不僅反映了臺灣學界在日治時期研究上的成績和局限，也牽涉到戰後臺灣的認同問題。

蔡龍保除研究交通史外，也由官員履歷資料著手，具體呈現臺灣總督府土木

¹² 林玉茹，《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張靜宜，《戰時體制下臺灣特用作物增產政策之研究(1934-1944)》(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7)；陳鸞鳳，《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神社的空間特性》(臺北：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林修澈，《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南庄事件：根據臺灣總督府檔案的理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7)。林修澈的書，資料性較強，因此不列入討論。林玉茹的專書為論文集，將有單篇論文的討論。

技術官僚的時態，並指出熟習西方近代科技的技術官僚，在殖民地扮演日本近代化經驗的傳播者之角色。林煒舒則由總督府的特別會計預算制度的建立著手，指出 1897 會計年度是臺灣預算制度建立之始。徐新堯則注意到臺灣官方的「請負」制度，¹³ 以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營繕單位為主，討論大環境和制度之間的關係。丁崑健則重建今雲林縣臺西、東勢鄉（海口莊）的公共行政，認為日治的地方公共行政，即使設有庄協議會，也只是「鳥籠式民主」。

有關日治警察的研究，有林一宏等探討李嶼山地區由隘勇線到設駐在所的過程，可說圖文並茂。沈德汶處理的是日治時期的浮浪者收容所。李理出身於北京社科院，受命研究日治時期的警察制度，探索臺灣警察制度的形成，並比較朝鮮及滿洲國的警察行政，指出在殖民地中，臺灣的警察制度十分獨特，在於對行政事務具有極強的干涉能力。蔡秀美探討日治前期臺灣的消防制度在臺灣社會之紮根，開啟臺灣防災救護系統研究的先聲。

鈴木哲造以「公醫報告」為中心，分析總督府對傳染病的預防、流行如何防治，而臺灣社會對此衛生政策又做出何種反應。陳鸞鳳探討臺灣總督府對「神社」、「社祠」興建和選址的法令規範，尤其在 1936 年「臺灣都市計劃令」公佈後，神社興建所具有的特徵，多所著墨。

戰後相關論文亦有可觀。張鎮圻探討 1945-2000 年海域巡防機構的變遷，以瞭解臺灣行政體系的運作情形及單位間競逐、縱橫之狀況；陳胤宏指出 1955 年省府疏遷到中部，除了因應疏散政策外，尚有中央對省府以疏遷之名行遷治之實的兩難，然而中央逐漸意識到反攻大陸的困難性，因而省府疏遷實際上造成中央與地方分治的事實。董天傑分析 1949-2000 年國家公園政策發展過程，並提出如何進行現階段制度重整，甚至重構的研究建議。黃柏松的研究指出梨山地區設置農場來安置榮民，是具有建立後備兵團的軍事及政治保防的目的。鄭巧君指出，1955 年所公佈實施的「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是專為華僑所設定的，1968 年創造香港僑資來臺的高峰，而至 1980 年底，華僑投資以建築業最多，服務業次之，反映獎勵的產業類別。

¹³ 所謂請負（うけおい）制度，約略等於今天臺灣的承包制度。

2. 由抵抗權力到解構權力

以臺灣民眾史的立場出發，探討臺灣人在各個時代的集體思維、統治者與抵抗行動者，仍是最重要的研究課題。林呈蓉指出日治時期的文明體驗與近代教育的滲透，形成臺灣社會特有的常民文化、精神價值與公眾意識，大異於其他華人社會。陳君愷則檢視臺灣民眾黨的眾多成員在戰後反抗國民黨的統治，此種反抗壓迫，追求公義的精神，不容被當代企圖「連結臺灣」的政黨支解利用、斷章取義。江宜樺將戰後思想分為革命民主、自由主義、新儒家、左翼統派與臺灣民族主義五類，及其與臺灣民主運動的關係；至於若林正丈的《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¹⁴ 與翁佳音的《臺灣漢人武裝抗日研究（1895-1902）》再版，仍能領該界風騷。

研究日治到戰後臺灣人的抵抗行動也頗不乏其人，陳俊宏討論臺灣民主國相關小說中虛虛實實的歷史。陳梁峰則檢視曾文農民組合之農民運動與地方菁英、農民抗爭活動的性格與模式。鄭志敏分析 1920 年代官方任命的高雄市街協議員和 1935-1939 年官派、民選的高雄市會議員間的背景差異，而其自治經驗對戰後政治的影響。王政文探討日治末期臺灣人抗日團體在中國大陸的活動，但並無新意。曾文亮等則指出日治時期法律人才，在戰後初期初遭排拒、否定的遭遇。陳翠蓮由政治、文化兩個面向，將戰後初期臺灣人的祖國經驗定義為「再殖民經驗」，並檢視此經驗對臺灣人國族認同的衝擊。蘇瑤崇則用臺灣總督府在臺統治的最後文書，指出戰後日本政府尚有良好的治安能力以維持臺灣治安，否定吳濁流所提「政治真空期」中臺人自律自治之說；又認為「臺灣獨立」並非出自日本少壯軍人，而出自臺人士紳，上述觀點欲翻案為定案，可能需要更堅實的佐證。湯熙勇研究 1946 年澀谷事件的發生背景與審判過程。侯坤宏以口述資料與回憶錄來呈現白色恐怖的無所不在；陳儀深則梳理彭明敏事件及與海外臺獨運動的關係；廖珮涵整理美麗島事件後黨外人士歷次的選舉傳單，指出他們終能走出陰霾、標舉理想的過程。陳佳宏則論述修正「刑法 100 條」之思想叛亂罪，使臺獨言論除罪化，從而使臺獨運動得到更寬廣的發展空間。吳叡人以 Isaiah Berlin「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兩種概念，分析日治時期政治運動與戰後「自由中國」集團的論述。

¹⁴ 若林的舊作譯本，乃譯 1983 年版加上 1984-1997 年間四篇論文的集成。

用文學作品為文本探討臺灣人政治認同的論文也屢見不鮮，黃文恒批判庄司總一《陳夫人》充滿迎合皇民化的用心，難以擺脫官方民族主義宰制臺灣人的立場；莫素微提出周金波《志願兵》，乃策略性地反映殖民地人民的人性思考，個人利益算計，對帝國作為皇民價值的懷疑之面向再加分析。廖秋紅將多位作家有關志願兵的題材一併討論，認為不同案例與作品，正顯示日治時期臺灣人身份認同的流動變異與多重層次的特質，進而批判過去研究者脫離歷史時空的主觀評斷。荊子馨則指出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提供一個由殖民地臺灣、被殖民者的位置出發，對西方帝國主義與日本殖民主義的反論過程。

人物研究是政治史不可或缺的成分，楊正彥對蔣渭水從事民族運動的研究有些老調重彈，蔡石山則刻劃李登輝由「日本人」成為「中國人」，到覺醒為「臺灣人」的政治認同的心路歷程。¹⁵

由研究抵抗權力到解構權力，使政治史研究向前跨了一大步，2007 年的論文也呈現此一狀況。首先是國家權力如何透過節日、儀典的展演，來塑造集體認同；辛德蘭探討日本政府如何在新屬地沖繩與臺灣安排皇室的視察活動，藉以加強與新附地的關係，以建構官民共享的歷史圖像，這和若林正丈、又吉盛清的論述若合符節；蔡錦堂追索「紀元二千六百年」的神話與奉祝活動如何在戰爭時期盛大展開，並被利用為強化國民認同的用途。蔡佩娥則追索「清明節」、「民族掃墓節」、「蔣公逝世紀念日」三個節日之間的推演，乃政治權力不斷滲透的結果。周俊宇有多篇論文做相關的探討，但總括來說，他比較戒嚴時期、解嚴後到政黨輪替前、後等三個階段中，重要固定節日的改變，來說明國家節日如何成為政治權力試圖掌控與創造的集體記憶場域。

有關教科書的研究，戴寶村指出新版教科書有助於臺灣民主化歷史知識的增長，但其改革幅度仍太小，對形塑臺灣人集體記憶、彰顯轉型正義等方面仍不足。許毓峰分析依 1975、1993 年課程標準所製的各版國小社會科教科書，竟然發現有關臺灣歷史知識的比例不增反減。王郁德探討臺灣中小學教科書中所表現的國族主義變動，質疑民主化後雖然多元開放，但政治權力仍意圖隻手遮天。李道緝探討僑委會如何形塑華僑對「新祖國」——臺灣的四海歸心，並為維持這種虛構

¹⁵ 原文為英文。蔡石山著，曾士榮、陳進盛譯，許雪姬校訂，《李登輝與臺灣的國家認同》（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

的政治認同所付出的代價。至於有關做為統治工具的傳媒，也有論文進行解構，謝侑恩以紀錄片「南進臺灣」說明臺灣總督府如何展示殖民統治政績、塑造國族認同並美化帝國擴張意圖。何力友則透過戰後五年間政府相關出版品析論當局如何由早期的「去日本化」、「中國化」與「政黨化」，轉變為反共、戡亂；林果顯考察 1950 年代的廣播節目，指出中華民國政府透過廣播，將反共備戰等信念更細膩地深入人們日常生活中，成為日後嚴密社會控制的基礎。張世瑛以陳紀滢的小說《荻村傳》為文本，探討其如何成為符合官方意識型態與反共文學的範本；陳康芬的博論指出 1950 年代反共文學的傳佈流行，顯示政治與文學之間既對抗又協力的複雜權力關係；林麗雲分析威權體制下三家無線電視臺的資本形成，發展出保護主與侍從的關係，並在營利的驅力下，共享寡占暴利；陳佳宏認為在威權時期傳播媒體配合國民黨政府意圖之下，使「美麗島事件」淪為祭品，成為社會全體宣洩撻伐的出口。

政治權力利用文化媒材操控認同的現象，亦為學界關注之點。陳美惠探討 1895 年代伏見宮貞愛親王征臺下榻之臺南鹽水葉家八角樓，在日治時期被總督府指定為史蹟名勝保護物件的榮耀，戰後政權轉移因而起了巨大的變化，以及葉家子孫如何在不同政權下保全私產、面對歷史的過程。蔡錦堂以蔡培火戰前親日、戰後親中的個案做為對比，說明跨越兩個政權的老一輩臺灣人的日本觀，受到時空因素極大的影響。Joseph R. Allen（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考察臺中公園有六處日治時期所遺留下的銅製神馬現狀，指出戰後神馬銅雕上紋飾的毀除、覆蓋，與近年來的修復與複製，與臺灣認同與政治意識的變化有密切的關連。李朝明藉由美術與國族主義關係的反省，理解臺灣政治變遷與臺灣主體性意涵轉化的過程。

二二八研究到後二二八研究，因 2007 年為二二八事件發生六十週年，因而有三次研討會。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合作、出版的《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紀念論文集》，重點在新史料的發現與運用，以及日本、中國的相關研究。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則舉辦研討會，著重於國際經驗比較與轉型正義的探討，¹⁶ 已進入「後二二八」的研究階段。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也以高雄為重點，探討二二八事件中的相關問題，出版《紀念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學術研討會

¹⁶ 楊振隆編，《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權與轉型正義學術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7）。

論文集》。年輕一輩的學位論文也有以二二八為題的，如石育民欲為蔣渭川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翻案，廖崧傑則考察二二八事件中《臺灣新生報》的報導，指出該報在 3 月 10 日停刊一天後，報導與言論立場幡然轉變，顯示國民黨政權開始全面控制臺灣媒體。顏世佩指出自 1987 年以來的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口述歷史、自傳與回憶錄的撰寫，甚至二二八紀念碑、紀念館的設置，都是以歷史為名進行統獨論戰與國族論述之實。洪英雪則研究不同社會情勢下的二二八小說，如林雙不與曾健民的二二八文學，對比出不同政治認同的書寫與詮釋方式。除了上述之外，臺灣社會也有部分人士對二二八事件提出特立的詮釋，出了不同類型的書，如人間出版社《2.28 六十周年特輯》，搜集事件當時的資料，中華基金會出了 4 本二二八事件專書，¹⁷ 內容多為舊史料的重新排列或摘錄。曾健民也執著地出第三本二二八事件專書，探討二二八前的臺灣。另有中央研究院院士黃彰健介於政治與學術之間、厚達 584 頁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討論稿》，為特定人士辯護，有損其做為學術著作的嚴謹性與說服力。

3. 外交、臺灣國際法律地位及法律史

外交方面以外交政策和外交關係為重點，「一中」原則臺灣的法律地位的相關論文也有，而由法律人從事的法律史研究正方興未艾。王泰升等編《以臺灣為主體的法律史研究》，收錄了 9 篇論文，其中陳榮隆、曾文亮、沈靜萍的法律史論文，在史料掌握上有相當的水準。曾文亮另篇文章釐清清代發展而成的祭祀公業，在日治引進近代法之後，從舊慣到以習慣上法人的形式，使祭祀公業成為日本民商法施行於臺灣的特例；沈靜萍注意到從傳統中國法過度到近代西方法體系的過程中，女性法律地位的轉變。王泰升探討源自西方自由立憲主義體制與近代法觀念，得以在臺灣生根的過程。至於吳俊瑩則以代書為主題，貫穿自清代到當代代書業的發展。林文凱則以社會學的分析方式，結合法律史的探討，使土地訴訟的討論呈現制度與社會互動的面相。

李建良針對國家統治行為相當重要的行政法進行日治時期的討論。黃丞儀指

¹⁷ 張克輝，《啊！謝雪紅》（臺北：愛鄉出版社，2007）；藍博洲，《二二八野百合》（臺北：愛鄉出版社，2007）；藍博洲，《青春戰鬥曲：二二八之後的臺北學運》（臺北：愛鄉出版社，2007）；陳明忠、陳敏鳳、郭承啟，《二二八的另一個角落》（臺北：愛鄉出版社，2007）。

出日治時期國家統治權力與殖民統治複合考量的法制建立與轉變，王泰升則討論日治時期引進近代法律制度以後，在司法層面的影響。李綸倫的碩士論文討論日治時期答刑由立法到廢止的背景，並整理了有關竊盜罪的資料；馬海倫則探討日治時期臺灣的獄政。

戰後的法律史研究，謝政道探討中華民國的修憲過程，陳弘毅比較臺灣與香港憲政之發展，指出 1980 年臺灣較香港遜色，但往後的 20 年臺灣急起直追，並超越香港。李福鐘論證大法官會議對中華民國憲法的解釋，提供國民黨當局永續執政及蔣介石朝向終身總統的憲政體制途徑，使原本該守護憲法的大法官會議，成為破壞憲法體制的協力者。

在法律的執行面，戴伯芬透過國家公權力的行使，指出國家機關先是在沒有法律規範下，對有線電視業強行執行，而在訂立法律後卻又放任不執法，埋下臺灣目前新聞媒體的諸多亂源。蘇瑞鏘以雷震案為例，釐清戒嚴時期透過法律處置對人權的侵害；孫健智的碩士論文透過法學期刊內容的分析，釐清 1949 年以後臺灣民法學發展之效果。張復鈞的碩士論文從司法體系的律師切入，探討律師對人權的態度，及相對於司法官的態度。

（四）社會文化類的成果

這部分約占全年論文總數的三分之一，今後應將社會與文化分列，且刪除純文學與較缺少歷史性的論文，這部分可分為以下九部分：

1. 教育史

清代的教育史相對於日治時期的豐富資料，成果偏少，本年度蔡豔卿的碩論以生命史的觀點出發，利用方志資料，整理漢人和原住民養兒育女過程中的生命理俗、教育概況。日治時期的教育史則有許毓凌探討就讀小學校的臺籍兒童之教育經驗、人際關係及跨文化體驗；陳美惠以鹽水國小發現「奉安庫」論述公學校設置奉安庫的意義、過程與禮拜教育勅語及「御真所」之儀式。游士德的博論旨在分析總督府於 1919 年發行的《公學校用漢文讀本》1-6 卷的內容和詞彙，以瞭解外國人編纂語言教材時的教材選用標準，但並不算成功。溫承偉的碩論以 1949 年發行《公學校修身書》1-4 卷、教書用書及編纂趣意書為分析對象，探討修

身教育之內容、特色、目的及影響。賴美玲探討「式日」歌曲之由來，公學校唱歌教育中的教授概況，學校校歌詞曲之創作及其特色。曾令毅透過教科書中的相關教材、校外觀摩活動及學生社團等，概述初、中等教育中實施航空教育之情形。

楊旭龍在擔任臺東大王國小校長期間，完成有關以大王國小為中心來探討臺東初等教育的碩論；無獨有偶，宜蘭國小校長陳銘珍也研究該校的發展史，然而這二部校史的資料尚可補充之處不少。陳順清的碩論概述戰前臺南工業學校的發展，並與改制後的臺灣省立工學院做比較。謝濟全探討嘉義農林學校的沿革、課程、師資等，謝明如以 1919 年以前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為研究對象。蔡錦堂則探討臺北高等學校與近代臺灣菁英的誕生。

在社會教育方面，郭佳玲的碩論由官方出版品整理部落振興運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皇民奉公運動之實施概況、參與人數等。室屋麻梨子的碩論以《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之「論議」和「傳記」為中心，探討該報之特色，並以特定主題來觀察該報作為「日本化」及「傳達政令」之工具性。王玉輝的碩論闡述 1921-1926 年旗津吟社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及保存傳播漢學的功能。吳文星探討京都帝大及其師生在臺灣舊慣調查事業中之角色和表現，以究明該校與臺灣殖民統治的關連性。

戰後的教育史亦是眾所矚目的研究領域，許文瑞探討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之形成過程與內涵、治校作為及其對臺大轉型發展之影響等。林姿君利用各種史料，探討戰後臺灣大學語言文學教育之建立與沿革，中文系師生之文化實踐及社會參與等等。陳君愷則批判戰後國民黨政權操控校園、剝奪學生的自治權，代之以黨化教育，導致日治時期中高等教育形成的自由學風喪失殆盡。歐宗明的博論則分期探討日治迄今小學教師身兼教練之形成過程及其歷史變遷。楊維琳的碩論針對 1960 年代臺灣現代繪畫運動，批判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相關文字敘述與圖片編選之缺失，並自編教材，俾作未來編寫美術史教材之參考。王嘉弘以《西歐大戰記：光復新生臺灣》一文為例，分析戰後初期民間文學中歌仔冊所發揮的宣傳教育功能，頗具新意。

2. 體育、休閒史

這方面的研究有江柏洲的碩論，依時代背景歸納社會及學校游泳發展之情

形，以探究戰後彰化縣游泳運動的發展；李尚儒的碩論則探討戰後臺灣桌球運動在組織、賽事及國際交流等三方面發展之情形。張廷榮的碩論分三期探究臺東縣各級學校棒球運動之起源及樣貌，除提供臺灣學校棒球運動之文獻參考外，亦提示各級學校棒球運動推展之方向。劉偉君的碩論，指出棒球運動的發展是臺灣社會史的縮影，亦即棒球已然內化至臺灣社會之中。黃啟賓指出高雄三信的支持，擁有專業壘球教練，連貫而紮實的訓練，高雄市政府長期經費支持，是高雄女壘比賽成績優異的原因。龍炳峰亦以女壘為研究對象，探討其推展之時代背景。本年度第三篇研究女壘的論文為黃啟賓所撰，他探討中華臺北女子壘球隊的培訓與選拔，並分析參加奧運會的比賽成績。

除了棒球、壘球之外，各種球類的歷史亦如雨後春筍，文多斌說明 1951-1957 年介壽杯籃球賽的舉辦，乃源於華僑之愛與熱情，加上軍方主導，使球迷瘋狂，開啟了臺灣的籃運；邵一銘則針對臺灣女子籃球員的撰拔與訓練、比賽和賽後檢討進行分析，林賢杰、陳定雄探討 1949-2007 年間臺南縣足球運動的發展，林鼎盛、陳耀彥則進一步探討臺南縣佳里國小足球隊的發展；鄭志勇、陳定雄探討羽球在臺南縣發展且成績優異的原因。吳俊升探討臺灣撞球運動之發展，及其所遭遇之問題。羅申奇、謝文雀探討后里國小角力運動發展之時代背景、過程及其成果，趙子文探討自由車運動發展之概況。

以運動會為主題的研究有日益增多之勢，金湘斌的碩論由殖民地化與近代化的雙重視角，探討日治初期臺灣初等學校運動會的源起、發展過程、實施內容及對臺灣人的影響等。林玟君、胡文雄探討 1946 年首屆臺灣省運動會在「中國化」背景下的發起、舉行過程及其意義。沈秋宏探討客家復古運動大會在東勢實施的情形、相關運動項目及其歷史過程。劉進枰擴大視野，探討 1952 年以降臺海兩岸透過運動表現及會籍名稱的角力戰，形塑 1981 年奧會模式之歷史過程及其意涵。戴佩琪以民俗體育為碩論的焦點，探討臺灣國民小學民俗體育之發展。彭文正等 4 人探討新竹縣發展民俗體育之背景、理念與政策，並對未來的發展提出建言。王建臺、沈峰明則探討宋江陣在內門鄉傳統鄉土文化上的意義和重要性。劉芝音的碩論透過女性主義理論觀點，探討過去百年來臺灣女性在不同時期的政治、教育及社會文化背景下體育運動發展之歷程。李雅莉研究「臺灣高爾夫之父」陳金獅之發展與經歷；江文瑞等探討 1982-1995 臺灣聘來美籍、韓籍射箭教練，

對臺灣射箭運動帶來的影響。陳耀宏探討戰後臺灣傳統活動受外來文化滲透，一度衰微，後經政治、教育、經濟三方面的配合下促成傳統休閒的再造與興起。張倩蓉討論 1895-1945 年間臺灣的觀光旅遊休閒活動。

3. 宗教史

查忻的專書企圖跳脫傳統教會史的反日觀點，重新檢討傳教士在「日本國家主義」和「臺灣民族主義」角力下的立場；另譯有〈荷蘭改革家臺灣教會殖民背景下的宗教 1627-1662〉一文，¹⁸ 譯者加入許多考訂、說明，對了解十七世紀臺灣社會狀況，荷蘭改革家傳教的情形，及政教間既合作又矛盾的關係有所幫助。吳敏霞有關日治時期臺灣佛教的作品，係為通論。張志相則論證南投、草屯、霧峰、大里的「七將軍廟」，均源自霧峰的「兵慶祠」。陳雪娟說明苗栗市義民廟兩百餘年間五次的改建及重修，並與枋寮義民廟作比較。王志宇論證悅興街媽祖與東螺街媽祖可能系出同源，並釐清彰化南部鄉鎮媽祖廟的承啟關係。洪健榮考察清代臺灣社會因風水觀念所衍生的流俗紛擾。陳俊宏釐清各家對艋舺教會設教年代的歧異說法。葉惠雯說明十九世紀末葉熟番借著遷徙將基督教信仰帶入東部且發展出鱓廣澳、觀音山、石牌教會的情形。謝貴又考察「全國保生大帝聯誼會」及其信仰、組織的發展趨勢。闕正宗論述戰前、與戰後中國、臺灣所舉行仁王護國法會的思想源流與召開的背景，及戰後加入國運昌隆、元首康泰、消災解厄、淨化人心、社會祥和等訴求。洪瑩發探討戰後大甲鎮瀾宮的發展。林承緯指出祀神主從關係有主神、屬神、客神，不同於日治時期宗教學者增田福太郎、鈴木清一郎的分類。

4. 媒體、傳播、電影史研究

此一與日常生活、休閒活動息息相關的研究也日趨蓬勃。蔡棟雄撰寫通論性的專書，乃以三重出生者的優勢，介紹三重地區相關之詞曲家、歌星、影星、導演、歌仔戲班、廣播人等。許天安的碩論探討幾部出現美國形象議題的政治宣傳國片，以反應國民黨對美國既批判又不得不合作的現象。黃儀冠分析客家文化意

¹⁸ J. J. A. M. Kueper 原著、查忻中譯，〈荷蘭改革家臺灣教會殖民背景下的宗教 1627-1662〉，《臺灣文獻》58: 1 (2007 年 3 月)，頁 1-53。

象在臺灣電影中的呈現；江詩菁的書探討 1975-1989 年臺灣媒體發展對抗之兩方陣營，即《中時》、《聯合》與黨外雜誌之間進行文化霸權的爭奪戰。呂美玲的碩論以《臺灣日日新報》的廣告為例，探討明治、大正、昭和等三時期之社會變遷。陳玟錚探討蔡培火在《臺灣青年》系列刊物上的角色扮演，可和蔡錦堂有關蔡培火的親日、親中交織的一生之論文互相參考。

5. 宗族、家族史

吳佳芸強調大溪黃家憑藉武力，得以強人身分號召民眾，並具有向邊區開墾的實力，進而提升其家族地位。何明星以新埔陳朝綱家族為個案，探討清代臺灣地方望族發展與地域社會網絡形成之關聯。由黃、陳兩家族可看出清代由於面臨內憂外患、開山撫番，給地方望族朝武質化發展，直到日治初期地方武力才被日本政府摧毀。黃秀政分析臺灣中部林姓移民創建與重建宗祠的歷程。吳蕙芳以基隆黃姓宗親會輪值主普中元祭為例，指出黃氏宗親會創會後積極投入中元祭相關活動，是其勢力得以日益擴張的原因。簡美玲等由親屬稱謂比較觀點來研究北部客家移民與地方化的現象。李季樺探討竹塹社接受賜姓，最後終於形成一族七房之框架，包含錢、衛、廖、潘、三、金和黎七姓的「異姓宗族」。黃克先用 Diaspora（離散）研究的典範，藉以反思四大族群架構下外省人研究的侷促性，以及做為離散團體的特殊性。丁世傑透過文學敘述文本的分析，再現臺灣家族世代在現代化變遷和政權轉移過程中所呈現的認同差異，也再現不同時光下不同世代作家本身的認同抉擇。

6. 建築史

顏娟英試圖由寺廟組織中媽祖會和改築會間微妙的關係，來看 1919 年彰化南瑤宮的改築。卓克華判斷新竹市香山天后宮的興建年代。陳韻筑試圖以彰化縣內之河港聚落和內陸聚落街屋立面形式做比較，期待可以找出差異點。洪千雅重新檢視驗證迪化街街屋立面之樣式名稱，給予迪化街中最引人注目的七幢建築新的定位。康惠嵐探討各族群間宗祠建築裝飾的差異；梁慧如以臺南地區七所教會為例，來探討其建築現代化的歷程。陳俊宏的譯著，¹⁹ 透過吳威廉的傳記了解臺

¹⁹ MacMillan, Hugh, 〈譯介《海外建造家：紀念臺灣的吳威廉 (William Gauld)》〉，《臺北文獻》直字第

灣北部長老教會起承轉合的情況，及臺灣大會成立的過程，同時了解吳威廉參與北部幾棟教會建築的程度。邱顯鈞研究宗教空間在不同社會背景下之演變及景觀元素的改變歷程。吳大維探討西洋建築語彙對臺灣傳統民居之影響；李盈儀以臺南市 54 間廟宇為例，探討剪黏在臺灣受政治和材料發展影響的情形；吳惠萍的碩論由教育法規，建築與都市計畫法規及建築材料，取得三面向來討論日治時期初等學校木構屋架演變；陳美惠對鹽水城做初步之調查研究。顏宏仰試圖以「讀圖」來建構日治時期繪圖——讀圖、詮釋——溝通間之社會層面意涵。蔡思薇擬由都市計劃、設施、活動三方面建構新公園的歷史，並藉以突顯出新公園於臺灣公園史上之特殊性；謝莉莉分析臺灣炊飯器之發展與其演化環境之時代需求，並鉅細靡遺地建立資料庫，為往後的研究奠定基礎。

7. 區域史

方真真說明十七世紀臺灣周遭海域的船難，分析當時諸多海難的原因，指出地理位置及環境對於人類生存的重要性。李若文指出海盜有異於常人的空間感，並從海盜活動的時空路徑，找出與海盜活動關係密切的區域與人群，建構出不同於官方的民間版海盜觀點。陳佳鑫探討日本殖民臺灣之後引入的泡湯文化，對新北投地區溫泉在地化的影響；王志文以淡水河和基隆河會口處的沙洲為場域，討論沙洲地形的演變與人群社會及行政區劃分的互動過程。施偉青指出渡臺禁令中沒有針對潮惠籍民的規定，且施琅也不可能憑個人意志禁止潮惠民渡臺。張永楨說明「水沙連」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空所代表的不同地理範圍；廖忠俊將以往研究臺灣地名的五位學者之分類架構整理成表，但未見考訂、糾謬、增添之處。范光淡指出大甲五十三庄與清代中葉的團練組織有所關連，而大甲鎮瀾宮進香活動則是大甲五十三庄存在的因素。翁純敏介紹吉野村移民與吉安慶修院的歷史沿革，但兩者間並未緊密地聯結；廖經廷則試圖透過異質化的研究將花蓮鳳林地區的日治與戰後客家做一初步的研究。許進發則對清末臺灣沿海地區的搶船事件與民眾風俗做一勾連，指出此為生活困苦所產生的集體意識，且是官方、民間等極為微妙的互動與詭譎的平衡。

8. 醫療史

巫毓荃（精神科醫師）探討 1935-1938 年臺北帝大心理學教室助手藤澤祚以原住民為對象，所進行一個憤怒的心理學實驗，對理解日本的殖民主義或殖民現代性，或原住民史的研究都很有貢獻。周忠彥探討教會醫師戴仁壽籌設「樂山園」的經緯；鈴木哲造以種痘預防天花的政策及鼠疫防治為研究主題，論述日治初期殖民政府衛生政策之展開。范燕秋探討臺北帝大醫學部創設的時代背景及其研究發展角色。盧忻謐等則探討戰後初期攸關臺灣人口增減的「家庭計劃」之歷史發展，為類似口述訪談的結果。學位論文方面中山善史討論日治初期日本內地「衛生組合」移植到臺灣的背景，及其運作概況和結果；張雅婷探討臺灣總督府高雄醫院的制度與運作狀況，及其對地方醫療近代化的影響；周惠彥說明 1934 年私立癩病療養機構樂山園（1928-1992）機構功能之變遷。詹雅筑探討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創立及經營，以及它如何被接受，從而改變臺灣社會對新式醫學史的看法，提升醫師的社會地位。沈佳姍則由生活史和社會史的角度，討論日治時期臺灣漢人清潔生活的變動過程。蔡姿儀處理臺灣瘧疾在戰後（1945-1965）二十年間的防治。林筱玲的研究指出戰後報紙中醫藥廣告中的女性圖像，具有傳統東方面孔與西方裝扮的造型，顯示民眾懂得自我提升與追求藥品卓越品質。陳家萱探討比較戰後不同世代孕婦所面臨的議題，包括懷孕經驗、醫療技術發展、產檢意義、社會權力關係與脈絡的轉變，以及其中的性別政治。陳姿伶以五個醫療相關博物館、文物館、院史館為中心，指出臺灣文化的載具（上述館）應有自己的形制，以展示在地精神。蕭彥卉探討近百年來吸毒者的身分變化，指出毒品及吸食者身分的變動，正是日本西式法統治由國民政府主導的法制，兩者的差異及繼承，反映在管制品政策的結果，是精湛的法制史研究成果。范佩瑄則針對殖民者——在臺日本人的精神疾病問題加以探討，指出強迫症在臺灣出現及發展，藉以得知日治臺灣精神醫學發展的特色。

9. 原住民史

這可分為研究原住民、平埔族與日治、戰爭原住民事務三大項。溫振華融合了考古學與歷史學，確立臺北盆地「了阿社」社址，及其在十七至十八世紀臺北

平原的重要性，以及臺中沿海平原「牛罵社」的社址範圍。許清保指出哆囉嘸社群雖位於臺南縣境，但並不屬於西拉雅族，卻與嘉義地區的諸羅山社等一起劃入洪雅族 LLoa 支族，是臺南地區較為特殊的原住民族。高業榮是最早從事萬山岩雕研究之學者，本年度再為文考據置於日本天理大學參考館的石雕版人像，認為是拓印複製品，並駁斥其他研究者的觀點。有關平埔族的研究則有 4 篇，許世賢討論清代南崁地區漢人與熟番的互助，說明除了傳統的業佃關係外，熟番還有其他方法維護自身的權益，如參與漢人的事務即其一端。張家榮利用古文書、文獻、方志、奏摺中有關北投社的社名，研究北投社的傳統名制。洪麗完利用多種史料，重建大武壠社群（四社番）迫內優生番（原住楠仔仙溪、荖濃溪中游一帶）移動的歷史過程。陳耀中的碩論有助於對清代平埔族的語言記載及其與閩語、漢語關係的了解。溫振華集其長年研究平埔族歷史的心得完成《臺灣原住民族史·政策篇（二）：清治時期》一書，其編寫脈絡環繞國家政策及相應問題，分成早、中、後三期加以敘述。林一宏等以李嶼山地區為研究空間，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山地的隘勇線系統如何轉變為駐在所系統，達成臺灣總督府對山地的有效統治。張耀宗則探討原住民的傳統部落菁英在日治時期轉型為受日本新式教育的領導菁英，戰爭動員期間在「青年團」擔任部落領導的角色，以證實轉變的完成。巫毓荃的研究在醫療史部分已觸及，不贅。趙啟明以淺井惠倫教授攝影集的影像為史料，以 1938 年 27 張萬大社群泰雅人照片，進行田野，按圖索驥，追蹤訪談，期能重建族人對「萬大社當年的歷史及記憶」，從而勾勒泰雅族的文人特徵及生活樣貌。戰後的原住民族問題，也是學者重視的領域，吳豪人以犀利的文字就 1950-1960 年代臺灣原住民的財產權加以探討，指出從日本政權到國民黨政府都是透過土地政策對原住民族進行暴力宰制，而原住民卻無力抵抗；林佳陵探討戰後初期原住民族政策與日治時期或民國時代中國的經驗之延續性問題。梁煒智探討原住民在日治、戰後土地的繼承習慣，討論其受到國家統治政策的影響；蔡桓文則試圖釐清日治、戰後時期當國家法遭遇原住民族習慣規範時，兩者之間產生的不相容現象如何處理。浦忠成對國民政府的原住民族政策加以剖析，指出政府藉由政治、教育、經濟等制度性措施，對原住民族遂行支配、掠奪與改易，而使原住民在 1970 年代尊嚴淪喪，而在 1980 年代引發原住民運動，並在 1990 年代迄今強力扭轉歷史的宿命。

（五）文化類的成果

1. 文學史

歷史學廣納文學史的相關研究成果，擴大了學科領域，可由三方面來討論，一是非中文文學作品，二是古典文學，三是新文學及其他；時代又以戰前和戰後為區分。有關非中文文學作品，可由李加展編撰之〈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文獻檔案之福爾摩沙文學考〉一文，看出其意圖為將早期荷蘭、西班牙等非中文，卻與臺灣相關的書寫文稿納為臺灣文學史之起點；費德廉（Douglas Fix）分析的是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的手稿《福爾摩沙紀行》如何「忠實再現」1860年代後期及1870年代初期的基隆到打狗之間的福爾摩沙嶼的自然風景，進而凸顯「風景」與「權力」之間所形構的辯證關係。阮斐娜則透過旅行文學與大眾小說，研究日本人由十九世紀後期到戰後所顯現的各式臺灣觀點，進而追尋、建構臺灣從「蠻荒之島」到日本「治理領土」的軌跡。

除了上述用非中文的文本來擴大臺灣文學的版圖外，將日治時期臺灣、朝鮮、滿洲等殖民文學做連結思考也是一種新的研究取向。下村作次郎透過吳坤煌與崔承喜的交流說明現代舞蹈與臺灣文學；朴宰雨論鍾理和的滿洲體驗和韓人題材小說〈柳陰〉的意義，來了解日、朝間的文化互動；金良守則探討鍾理和的滿洲體驗和朝鮮人；孔祥曉的碩論也對日治時期臺灣與韓國新文學小說中的歷史經驗做一比較。

清代古典文學方面，有吳毓琪等對康熙年間在臺宦遊詩人的情志體驗加以探討；許惠玟則對道咸同時期（1821-1874）臺灣本土人士的詩作予以研究。除詩文外，也有就散文或賦的研究，如林淑慧、游適宏的作品；研究詩社和儒學也是重點之一，余美玲對詩人林爾嘉的生平與活動予以探討，陳淑慧則介紹南社詩人陳筱竹；儒學研究數量不多，如謝崇耀談《崇聖道教報》；江啟綸分析《孔教報》；黃美娥勾勒鄭氏至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發達的歷程；廖振富的專書中之一篇，以詩人作品談二二八事件相關之臺灣古典詩。李知灝則留心戰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以《中華民國文藝史》中官方古典詩史觀的建構，來談被嫁接的臺灣古典詩壇。

在新文學方面，陳南鸞談日治時期農民小說中的菁英主義和農民形像；周馥

儀談臺灣知識分子的糖業書寫。柳書琴探討跨域左翼文學運動中的旅日作家；陳培豐的兩篇相關論文，有異於已成定見的世界／日本左翼思潮影響，或臺灣文學主體性建構論的詮釋框架，採以「文學現代性」、「東亞語言近代化」的視角，重新解讀鄉土文學與臺灣話文運動中的語文「聲音」與「文體」近代書寫，與大眾識字、閱讀的真正意義。

此外，以屬地的觀點研究在臺日人的文學活動與作品的論文也陸續出現，陳伯軒研究《陳夫人》的空間隱喻與文化歸屬，張文薰研究濱田隼雄的文學軌跡，謝崇耀探討小泉盜泉及其漢詩；顏杏如對於在臺日人引進櫻花植物的辭、景觀所做的文化論述。游珮芳對內地、在臺日人所從事的兒童文化活動加以描述；周華斌針對在臺日人或報刊中相關日本古典文學短歌與俳句的集體創作情形加以探索；黃美娥對日本來臺漢文人的漢詩活動與詩歌知識論意義的整體解讀。蔡寶瑤的碩論則研究日治時期臺灣歌仔冊之文化意義，是少數研究日治時期民間文學的專著。

至於「漢文通俗小說」與「漢文」也成為新興的研究對象。本年度黃英哲與黃美娥編輯出版《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集》，有利於確立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之研究意義與價值。柳書琴對《風月報》的研究，有益於通俗文學、文化議題的深化與探索。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的出現，可以帶動日治販賣、出版漢文通俗小說的重要書局之研究；林以衡以報刊作品考察日治時期漢文俠敘事的階段性發展及其文化意涵。林淑慧研究謝雪漁的〈日華·英雌傳〉；李友煌探討徐坤泉的《可愛的仇人》之時代性意義。張愛敏也研究徐坤泉的〈新孟母〉。至於漢文議題也十分熱門，已意識到要釐清文言文漢文、臺灣話漢文、北京白話漢文，到日本近代國語的確立，其間的相互關係；邱雅萍由日刊報紙廢止漢文欄看「臺灣式白話」的面貌。室屋麻梨子研究《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版，柳書琴探討戰爭期漢文現代文學雜誌《南國文藝》的創刊；黃美娥也由所謂跨界傳播、同文交換、民族想像討論賴山陽在臺灣的接受史。

以現代視角出發做臺灣相關研究的，有翁聖峰探討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爭；謝崇耀討論新學會之發展與時代意義；簡素鋒探討臺灣殖民地現代性的建立與張深切思想的指標性意義。陳允元討論 1920、1930 年代臺灣小說的都市圖像，星名宏修討論徐瓊二的〈島都的近代風景〉，或談 1930 年代之貧困的描寫閱讀複數

的現代性。

臺灣文學史迄今未能有好的纂修，由於對臺灣文學史的想像不同，張錦忠、黃錦樹主編《重寫臺灣文學史》，質疑原有的臺灣國家文學史的想像，凸顯「重寫」臺灣文學史的必要性，提出「無國籍文學史」或「文學複系統」的說法。這是具有強烈「針對性」解構史觀之文學史觀點，本書作者既質疑原有國族主義史觀，但又強調馬華文學要安放在內，否則就是排他，這似乎難免於另一種政治性格的彰顯。《臺灣小說史論》由陳建忠等五人合寫，乃試圖藉由斷代文學史論的方式，對文學史書寫提供觀點的翻轉以促成一部臺灣小說史之誕生。戰後初期的文學史也漸被重視，黃英哲日文專著譯成的書，討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如何由「去日本化」「再中國化」。陳建忠對戰後（1945-1949）文化或文學的研究，指出臺灣知識份子的發言及創作傾向、大陸來臺文人引進的左翼文學思潮，為兩條各自繼承不同的新文學傳統脈絡。戴華萱的博論旨由成長的視角重新閱讀被定位為「反共」、「懷鄉」的小說，同時包括 1950 年代本省及女性作家的文本，藉此探討各種風貌的成長關懷。葉淑美以由《中國文藝》刊載的近三十首翻譯詩作，對 1950 年代初期西方文藝思潮浪漫派的引介，或可視為反共文藝作品的反動。王鈺婷以大陸來臺的第一代女性散文家的相關文本為主，她們書寫臺灣鄉土「異質性」的差異，來詮釋新移民女作家的臺灣圖像。應鳳凰則將文藝雜誌區分「主導型」、「前衛型」、「大眾型」，企圖透過這三型所架構的「三角圖形」及其聚集的作家群落，描繪 1960 年代臺灣文學的生態形貌。翁淑慧的碩論，論證 1960 年代臺灣文壇並非全盤西化，而是具備了相當程度的「現實性」與「在地性」。

在女性散文方面，張瑞芬的專著討論臺灣近半世紀（1949-2005）女性散文的發展與流變，並對重要的女性散文家作品重新評估。陳政彥的博論討論戰後臺灣現代詩的論戰，是現代詩文類知識不同主張之間互相協調的過程。浦忠成的書探討原住民的神話、歷史與文學，尤其是故事與口傳文學。陳國偉有關小說中族群的書寫，指出解嚴後，以福佬族群為主體的「臺灣意識」，引領臺灣社會整體對於國家的想像與認同，而臺灣其他族群也在此影響下，做出各種不同的回應。

至於徐耀焜的作品，則以 1949-2004 年臺灣飲食書寫作品為研究對象，關照了近幾年各種重新被重視的次文類現象。

2. 音樂、戲曲與美術

在戲曲方面，林鶴宜以一位傳統戲曲研究者出發，指出傳統戲曲的發展並不只是單純的藝術傳承問題，更和經濟發展、臺灣市鎮生態環境的變遷息息相關。徐良哲的專書以歷史性的唱片有聲資料作為臺灣歌仔戲研究的依據和佐證；徐元彥的碩論由有聲資料來檢證「爵士樂」比西洋古典音樂更易於與商業性的戲曲音樂互相結合，從而進入到臺灣人的音樂生活中。

在歌謠創作方面，郭郁婷以已出版的阿美、卑南、鄒族之影音資料為例，來探討臺灣原住民的創作歌謠。劉木燕則分析光復前後的閩南語流行歌曲；謝杰廷、連憲升分別處理知名歌謠作曲家陳君玉和作曲家呂泉生的歌謠作品。王政益、林佩娟、劉文祥三人的論文，為同一個教授指導，都以國樂為主題，以音樂的外緣因素，特別是政治、社會變遷與國家機器對於文化事務的干預或指引來探討戰後臺灣國樂的發展歷程。然而必須注意的是與「國樂」的刻板印象對照下，臺灣「現代國樂」因應本土化潮流，與社會主流文化接軌的多元化嘗試，並以劉學軒的作品《鄒族之歌》、《霧社（1930）》為例。

美術史的研究向來不乏其人，但在各領域中似乎進步較慢。崔詠雪指出清代臺灣書畫主要「臨摹」明清江浙、福建的畫家，因此造成追求質勝於文的野性臺灣特色——閩習。蕭瓊瑞沿用王耀庭的「閩習」說，但更進一步提到由「閩習」風格的源流以及在臺灣流傳狀況。黃瑩慧自郭雪湖在「南街殷賑」來探討其創作風格及地方色彩；林明賢探討 1895-1945 由「寫生」「地方色彩」所建構的臺灣美術風貌。林惺嶽強調臺灣南國風光的塑造，深藏背後的動機是殖民者文化優越感與統治管理的需要。廖瑾瑗探討《民俗臺灣》中民俗內容的歷史意義與定位，特別是原本應該是單純採集者發表的園地，卻成為呼應日本殖民母國政策之工具。顏娟英探討彰化南瑤宮改築過程中，新、舊風格之建築改變與選擇主權之決定等問題。謝世英探討臺灣畫壇發展出的地方色彩矛盾、揉雜的性格，既要求臺灣向日本「中央畫壇」看齊，又欲鼓勵臺灣發展的特殊性。

3. 女性研究

有關生活史方面，鄭秀美針對日治時期的婦女勞動群像做研究，構出臺灣工

業化初期女性勞動者的生活型態；賴佳欣鎖定 1970、1980 年代臺灣文學中的女工書寫，將女性勞動置於國家體制、資本主義發展，世界經濟體系等網絡來觀察，亦注意及女性所身處的多重壓迫。鄭惠美透過鞋子與大襟衫，建構出客家女性庶民生活史的一個斷面，也指出南北、政經環境、生活環境不同所造成的差異。林淑舟探討女性眼部化粧風格的演變，陳盈璇關於女性內衣與身體美學流變的研究。女性的身體研究也不乏其人，周宗賢對廖氏嬌被日本政府旌表之相關研究，彰顯出國家體制如何挪用中國傳統價值，詮釋女性楷模。林淑慧對〈日華·英雌傳〉的研究，在探討作品中的俠女角色。張愛敏由徐坤泉的作品〈新孟母〉之研究，彰顯出女性身體在幾種不同文化語境下的身體展演與性別話語。蔡依玲由女性身體／殖民國家／父權體制多種關聯的脈絡來思考「解纏足運動」。有關女性的閱讀，呂明純以宏觀的視野建構日治時期女性書寫社群的集群性圖像。陳怡君由時代脈絡來討論楊千鶴的人與作品，柳書琴對《風月報》讀者群與都會女性識字階層之間的關係，將大眾文化、女性議題與女性大眾扣連，開啟了日治時期女性識字階層相關的新圖景。王鈺婷針對 1950 年代女性散文做研究；李麗華對解嚴後女性自傳的研究。徐惠倫對戰後初期女畫家的研究；張嘉倪對臺灣電影中母女關係的探析；劉乃慈對當代小說中「女性主義」符碼之挪用、馴化與架空之探討。張瑞芬在研究散文多年後，建構了女性散文史；羅秀美以蔡珠兒的食物書寫，試圖彰顯其散文的知識系統與美學實踐，從而思索「女性知性散文」知識、生活與文學美學冶為一爐的可能性。徐國明對伊苞《老鷹再見》的研究，也使原住民文學、女性散文、旅行文學研究向度的跨界結合與對話有了新的可能。

三、研究成果的評論

上述分由總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大類介紹研究大要，以下則要加以綜合討論。

(一)就研究的時代來看，如果就 2007 年臺灣史的研究筆數 1,041 筆來看(若由跨類來看，筆數則為 1,077 篇)，史前與早期的 13 筆最少，貫時性、跨時代的通論有 107 筆，其次清代 134 筆、戰後 271 筆、日治時期 335 筆。回想 1980 年

代臺灣史開始「成為一門學問」時，絕大部分都以清史的研究為多，何以短短 20 年中清代研究成為少人問津，而日治、戰後的研究卻大幅增加呢？考其原因，研究日治時期筆數增加的原因為：1. 解嚴後研究日治時期較少意識型態的束縛；2. 除了英文外，日文也成為年輕一輩踴躍學習的對象，能突破語言的障礙，直接閱讀日文史料；3. 日治時期重要史料、數位資料陸續出現，如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臺灣日日新報》、臺灣人物資料庫，加上私人日記的刊布，如《水竹居主人日記》、《灌園先生日記》、《楊英風日記》、《鍾理和日記》、《王昶雄日記》、《楊守愚日記》、《簡吉獄中日記》、《楊基振日記》、《吳新榮日記》等；4. 與日本的臺灣研究會（關東、關西）、高一生研究會等會的成員能進一步交流，甚至加入為會員，也有日臺交流協會的獎金可以申請，增加赴日研究或參加學術研討會的機會；5. 在臺灣史學界中，有不少專攻日治時代臺灣史的學者，因此指導學生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至於戰後史受到青睞，主要是貼近時代，學者對戰後的現象極為關心所致。陳翠蓮分析戰後政治史研究增加的原因，除了個人偏好的因素外，亦有外在因素的催化，如 2000 年民進黨執政後加強史料的公開，2002 年檔案法實施，也促使戰後檔案史料相繼出土，確實有利於戰後政治史研究。其次相對於其他斷代研究需具備他國語文或古文能力等學術門檻，戰後史研究的語文門檻較低，因而對部份研究者具有吸引力。個人認為戰後史（或戰後政治史）增加的原因除上述原因外，乃增加了「中華民國史」，亦即以國民黨或中華民國立場來詮釋戰後歷史的論文也被《文獻類目》收入，雖然作者或學界也許有不同的看法。

另外，研究清史較少有到國外交流的機會，歐美甚至日本學者大半針對殖民地時期和戰後的臺灣較有興趣；對岸中國召開臺灣史的相關會議總是有些政治性，而其水平也並不高，因此不能吸引年輕一輩前往。²⁰ 至於史前與早期，則礙於荷、西語文較難突破，且資料相對地有限，研究成果往往敬陪末座，亦情非得已。至於跨朝代的通論性論文，較難掌握史料與史觀，較少人從事，亦事所必然。

²⁰ 雖然最近十年來清史的研究因史料的數位化，中國自 2002 年的纂修清史，以及羅友枝 (Evelyn S. Kawski) 提倡重新評估除漢民族外，其他民族在清史的角色及其貢獻而引起何炳棣的嚴辭駁斥，這三件事引起清史的研究熱潮 (見葉高樹，〈最近十年 (1998-2008 年) 臺灣清史研究的動向〉，《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0 [2008 年 12 月]，頁 137-193)，但似乎在清代臺灣史的研究上，未見同一現象。

(二)就論文性質而言，總類 50 筆、政治類 308 筆、經濟類 144 筆、社會文化 362 筆、人物傳記 88 筆、史料 125 筆，以社會文化所占的筆數最多。主要的原因是《文獻類目》企圖擴大臺灣史的範圍，將不少臺灣文學（有些不一定具有史的要素）論文收入，其次將社會與文化兩個學門合併估算，既使筆數膨脹，也削減了經濟類中的「社會經濟」。當然，臺灣文學史論文數量的增加和國內共有 10 所臺灣文學系所²¹ 有極密切的關係。總類中的臺灣通史，在國內出版三冊，只有一本是科班出身的學者所著；往後通史類仍需加強。方法論和研究回顧方面的正式出版亦不多見，研究回顧與方法論最常出現的是學位論文，但因未必出版，即使出版亦未被視為一筆來加以討論，而是就該書的主旨進行評價，這也是研究回顧、方法論少的原因。

人物傳記雖然有 88 筆，但本次並未針對人物傳記分類做評介，而是將之分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類或通論，綜合探討，因而有必要在此略做說明。在通論方面，有 3 筆研究佛教居士、近代社會菁英、廿世紀代表性人物者，即一書包括多位人物。至於清代的人物則因中國為了「紀念劉銘傳首任巡撫 120 週年」所開的學術研討會，編成《劉銘傳與臺灣建省》就已占了 20 筆。因此，人物仍以日治 29 筆、戰後 19 筆為多。至於出版史料，以戰後 48 筆為多，其次為日治 41 筆，清代 3 筆，清代仍占下風。最主要是史料種類大別為總督府檔案、資料彙編、空間及圖像、方志類、口述歷史五部分來看，清代除了文建會列為「臺灣方志彙刊」的 14 筆，加上故宮博物院典藏的臺灣史料持續問世才有 23 筆，亦即清代的史料以點校重刊和選編資料為多，其他方面，尤其是口述歷史就無清代插足的餘地。

(三)就論文的撰寫者而論，臺灣史核心研究學者在 2007 年的成績如何？首先，依服務年資及輩份，將研究臺灣史學者分為資深、中壯、資淺三類，共計 126 人，分別為 44、64、17 人。²² 分析樣本排除學位論文 215 筆，英、美、日、中國等學者文章 217 筆，以及史料類 112 筆，2007 年國內臺灣史研究成果共計

²¹ 這 10 所臺灣文學系所分別為：真理大學臺文系、政大臺文所、臺大臺文所、清大臺文所、中興臺文所、靜宜臺文系、彰師大臺文所、中正臺文所、成大臺文所、高師大臺文所、花蓮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²² 本分類以研究臺灣史學者為統計樣本，依其學術資歷分為資深、中壯、資淺三類，服務年資滿 20 年以上者，列為資深組，20 年以下 5 年以上者為中壯組，5 年以下為資淺組；除服務年資外，另視其輩份資歷進行微幅調整。

497 筆，佔《文獻類目》總篇數的 47.7%。在 497 筆中，資深者佔 29 篇（5.8%）、中壯者 88 篇（17.7%）、資淺者 11 篇（2.2%），共計 128 篇，佔分析樣本的 25.7%。其他研究者發表的文章計 369 筆，佔分析樣本的 74.3%，主要集中在跨領域學者，少數研究生及文史工作者。單純就個人而言，先不論品質，而以筆數來論，不妨依《文獻類目》中的〈編著者索引〉，舉出前 10 名和筆數以為參考。²³ 筆數最多的是黃美娥，共有 9 筆，她有 1 本專書、合編書 1 本，點校 5 本方志，論文 2 筆；許雪姬共有 8 筆，包括 5 篇論文、主編 2 本日記、合訪 1 本口述史。²⁴ 王泰升 6 筆，合編專書 1 本，方志 1 本，論文 4 筆為多。其餘 4 筆的有何義麟、侯坤宏、蔡秀美，²⁵ 3 筆的有林玉茹、林呈蓉、洪麗雯、張素玢、陳俊宏、陳美惠、陳培豐、曾文亮、蔡慧玉、薛化元、戴寶村、蘇瑤崇、蘇瑞鏘。

（四）就傳承而言，王泰升、吳文星、黃秀政教授指導下的學生都能集中在某一領域而有所突破，就法律史而言，以王泰升的學生主編的《以臺灣為主體的法律史研究》，共收錄 10 篇臺灣法律史的論文，而他的學生曾文亮、劉晏齊、王志宏等，表現出傳承法律史研究的氣勢和成績。吳文星指導的學生如吳明勇、蔡龍保、蔡秀美、謝明如、王麒銘，都以研究日治時期為職志，都能深入利用臺灣總督相關檔案，人物資料詳贍，藉由師生的通力合作，戰前東京帝大等學術機構或技術人員與殖民地經營的關連性，不再只是概念性的、抽象的學術與政治的思辯，而是具體的人物群像重建。黃秀政則率領學生做方志、或地方史的研究，或修纂方志，如對《臺灣通志稿》和《臺灣省通志》的比較，注意及目前各類專史研究尚未蔚成風氣時，學藝志的書寫開啟戰後臺灣藝術史的寫作風氣，如曾鼎甲、李昭容、陳靜寬、李巧雯、王靜儀等人的作品，亦值一觀。

上述三位教授所形成的研究團隊外，在古蹟、古建築相關研究上，中原大學黃俊銘教授也帶領其研究團隊，正在努力中；即將退休的施添福教授，數十年來指導學生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地名普查，師生的成果，亦為有目共睹。相信在

²³ 個人有 4 筆資料者有中國大陸的華強，但因其 2 篇論文（其中有一篇合寫）都是有關劉銘傳研究，分別分在政治、人物類，嚴格來說只是 1.5 篇論文，因而不列入。

²⁴ 在《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07 年度》，頁 152 所載；許雪姬有 9 筆，但其中頁 33、頁 118 並未有其作品，但頁 125 有 2 筆資料，是為 8 篇。

²⁵ 蔡秀美共有 4 筆，其中 1 筆是翻譯山中永之佑的論文，1 筆是碩論，2 筆是由碩論改寫的論文。見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編輯小組編輯，《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07 年度》，頁 158。

上述教授的引領下，可以創出更堅實的研究成果，並學習互相論難、勇於討論、協助他人完成論文的風氣。

（五）跨學科的研究，擴大臺灣史的邊界：由《文獻類目》所收的論文看，專史、斷代史、通史都包含在裡頭，且不抱殘守缺以嚴格的定義來刪除對臺灣史研究有用，卻不必然完全符合「史」要件的論文。擴界最多的，要屬文學研究，如臺灣、朝鮮、滿洲殖民地文學的聯結、個人不同的殖民地經驗書寫也都納入。尤其日治時期生活於臺灣的日本人也使之成為臺灣史研究的重要範疇之一，將古典文學、新文學、民間文學作品，搜羅淨盡，不僅如此，也將臺灣與東亞（亞洲）的文學做聯結，以東亞共享的歷史與文化語境為背景，進行更深刻的比較與本體反思。此外，將中國史中的中華民國史研究（自 1912 年始迄今）也包攝在裡頭，王泰升曾說中國史和日本史都是臺灣史的一部分，因此對海外臺灣人的研究也逐漸受到重視。簡而言之，臺灣史的範圍膨脹得很大，既屬人又屬地，但如果臺灣史不管是本土、外來的人形成的歷史，都屬於臺灣史的範圍，固然可以容納百川而使臺灣史無限廣闊，那是否又會陷入沒有主、配角之分的現象？換言之，臺灣史是否會喪失其主體性，這也是值得深思的問題。今後編《文獻類目》時，更要重視的恐怕是如何妥當的劃界問題。臺灣史的邊界雖然向外延伸，但史家最重要的技藝——史料的考訂，是否會在其他學科的浸淫下，變成以論代證？又對某些概念、理論的快速借用，囫圇吞棗的結果，也許會增加可讀性，但史學的基本要求安在？長此以往史學雖擴大範圍，卻會被跨學科的專史研究壓迫得難以喘氣，因此史學者絕不能抱殘守缺。如何選擇、辯正相關概念、理論，加強跨學科的訓練，才能深化史學研究。近年來人文學科的研究已由後殖民理論進而談到現代性，或東亞的詮釋框架來思索研究的徑路，日本帝國下殖民地的比較研究、日本殖民主義與歐美國家（尤其是英、法）的比較、殖民地前後政權的比較，都是可以展開國際對話的主題。而如何培養、訓練年輕的研究生，更是刻不容緩的事。

（六）史觀的問題仍然未取得共識：這也是臺灣史研究最吊詭的現象，亦即對日本統治臺灣的歷史，王曉波、許介麟都大力批判「皇民史觀」，即認為將日本對臺灣的統治用資本主義化、現代化來解釋，是完全自失立場的論調，因為日治的臺灣是「警察王國」，而非「現代化的奠基者」、「文明的傳播者」。由於上述

不同的史觀，因而本年度的臺灣通史類就呈現史觀各自不同的通史。無獨有偶，向來以臺灣為主體思考的臺灣文學史，也受到挑戰、質疑，想要以解構史觀來凸顯重寫臺灣文學史的必要性，甚至強調要將馬華文學安放其中。在二二八的研究中，更可看見針鋒相對的論點，甚至歷史事件成為個人表達政治立場的工具。時值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不同想法的人各自利用自己所能發揮的舞臺，固守自己的政治主張，其論述觀點，不論解釋由宰制到抵抗、集體失憶到恢復記憶、從質疑摸索到重建臺灣主體性的特性，或者毫不隱諱指出記念二二八的出版，旨在「同族不再相仇，兩岸和解早日到來。」依然顯示臺灣歷史解釋的歧異性。

（七）史料的刊布對研究起了正面的意義，但仍需慎重使用：自《熱蘭遮城日記》、《荷蘭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一）1622-1626》、《艾爾摩沙島事務報告》的中譯出版，對荷西時期的研究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如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即拜荷文資料刊布所賜。而《灌園先生日記》的刊布，對日治歷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自毋庸多言。近年來資料的方便使用，也造成了偏看史料、史料因用關鍵字搜尋而零碎化（不看全文，只看文中相關部分）的現象；甚至不斟酌史料，即主觀選取；或只是以時間縱軸排比下即完成論文；如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的資料庫，《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尤其後者，常有作者研究某某主題，只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例，常未對報紙資料做應有的考訂；即認為是難得的一手史料而加以使用。主觀使用資料而有違客觀之事，亦可在2007年度某筆學者的「研究論文」中發現，亦即研究者並非以追查歷史事實為目標，反而選擇性地使用史料，用以支持個人主觀的政治信仰，甚至有意阻撓該書評的刊出，究竟學術研究與政治信仰間的分際何在，值得深思。

（八）學位論文數量增多：學位論文每年產生的數量，約佔《文獻類目》筆數的15-20%左右，大約二成，而臺灣史相關學位論文，也由1960年以前的零產出，到2001年大幅提升至41.7%。若由1982年以前、1983-1992年、1993-2002年間三個區段的研究趨勢來看，臺灣史學位論文在數量上有大幅成長，且以政治、經濟史的研究占多數。至於斷代，在1982年以前清代占66.67%、日治佔18.52%，至1983-1992年，日治的研究已超出清代，占36.99%，清代則降至34.25%，戰後則提高到24.66%，清史雖然占第二位，但與日治仍相差無幾，值

得注意的是戰後學位論文已超過二成。到 1993 到 2002 年間，則戰後占 36.5%、日治占 27.9%、清代占 21.2%，戰後已躍升為第一位，清代已敬陪末座。2004-2007 年（以《文獻類目》收錄的為文本，所做的觀察），清代、日治、戰後的學位論文的比例是否產生變化？若以 2007 年來看，清代占 10.2%、日治 34.9%、戰後 46.5%、早期歷史（鄭氏王朝、荷、西）0.7%、通論 14.4%，可發現戰後所占的比例，除 2006 年稍低於日治時期外，已穩座第一。至於這四年來研究的趨勢，呈現社會文化占 47.8%、政治占 26.4%、經濟 20.1%，以社會文化為多。戰後、社會文化的研究，在近幾年學位論文中占較大的比例。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非史研所產出，卻以臺灣史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比重也在增多中，由表一即可見一端：

表一：2004-2007 年以「臺灣史」為研究對象之學位論文

	史研所	百分比	非史研所	百分比	總計
2004	54	73.9	19	26.1	73
2005	49	32.2	103	67.8	152
2006	47	24.1	148	75.9	195
2007	41	19.0	174	81.0	215

資料來源：余昌蓬，〈學位論文視野下的臺灣史研究：以《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2004-2007 年度）為中心的討論〉，2009 年 5 月。（未刊稿）

由上述比例可知，非史研所的產出已占了絕大比例，呈現 19% vs 81% 的差距（由 2004 的 19 篇到 2007 的 174 篇），今後臺灣史學位論文的主力，是否仍為非史研所的博碩士的論文，值得繼續觀察。

四、對未來研究的期望

在探討了 2007 年臺灣歷史論文、專著的分類，時期，撰寫者，邊界，史料，史觀後，亦應指出總論、人物傳記、史料、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特色，以及可以加強的地方。

(一)就總論而言：通論中以臺灣通史的論著最值得注目，除在北京出版的與中國的立場一致外，學院的《簡明臺灣通史》(中、英文版)、《図説台湾の歴史》(日文版)外，也有學院外的《臺灣史綱》、《臺灣人民的歷史》、《臺灣通史》等，雖不一定符合學術水平，但多元探索臺灣的歷史仍是可喜的現象。另外《臺灣史小事典》的日譯本、英文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aiwan* 的第 3 版、《臺灣古文書常見字詞集》等工具書的出版，年表、目錄、史料介紹、書目都不斷出現，呈現臺灣史研究的活力。但各類詞典的編纂，通史、文學史的撰寫，仍為刻不容緩。

(二)就史料而言：臺灣總督府明治永久保存文書的目錄共 24 冊，本年度已全部刊完。當上述目錄由日本中京大學出版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實不必再對總督府檔案做過多欄位的細部描述，反而應將中京大學所出版的資訊，補充到明治時期的檔案描述；而更當務之急者，為先整合總督府檔案和大尺寸的圖表兩個資料庫，再利用整合的同時，一併修正檢索系統，才會使這批珍貴檔案得到更廣泛的利用。就資料彙編方面，荷、西文獻的中譯、東西文化交流相關文獻的編目，再加上《灌園先生日記》的續出與《楊基振日記》的刊布等，方便學界使用。日本刊刻的教育史料、愛國婦人會史料值得注目。至於二二八有關報刊資料彙編，則對我們了解上海、福建如何看臺灣的二二八，提供捷徑。戰後的相關史料由明清的臺灣檔案陸續出版，故有利於研究工作。不過《全臺文》的刊布，不論在選取、編排都有瑕疵，也既未對讀者交待這些文章如何選取；史料本身的校對工作也未盡理想，有時也需要適度地註解，才有益於讀者利用。在空間與圖像上，利用總督府檔案對嘉義市街、酒工廠做綜合分析，是相當紮實的研究，但上述有關日治時期五萬分之一臺灣地形圖新解，想將 6 種不同時期的地圖整合成一部完整的臺灣地圖，雖然用心良苦，但因不同比例尺在放大縮小下，反而呈現凌亂。在方志類上，點校《臺灣方志》的刊布仍繼續進行，新修方志兩本——鹿野、水里鄉志，還有黃秀政及其學生有關方志的著作，讓學界重新認識《臺灣通志稿》和《臺灣通志》。上述的探討美中不足的是沒有對日治時期類似方志的地方《一覽》、《便覽》或初期方志做更深一層的研究。至於口述歷史，眷村、佛教人物、文學家的訪談是本年度的特色。日治時期臺灣民間資料的缺乏，有賴大量口述歷史資料的採集，希望除出版註解相關史料外，口述歷史的工作也應積極進行。

(三)就人物傳記：前已說及清代人物幾乎是研究劉銘傳的天下，但水準不高。日治人物中在臺日人的研究值得注目，如姉齒松平、西鄉菊次郎、八田與一、植村正久、高野孟矩、賴山陽、素木得一。至於有中國大陸經驗的人物則有鍾理和、吳濁流、李偉光、林爾嘉，也有探討臺籍戰犯，還有外省老兵的生命史，這些都是較為特別的研究成果。雖然歷史人物是歷史著作中最有趣，又是最基礎的，但本年度相關作品並沒有特別多，如何鼓勵人物研究，亦是當務之急。

(四)就經濟史而言：本年度在數量上雖不如政治、社會文化史，但在產業史、土地史、交通史、工業科技史上的研究篇章不少，特別是交通史和造船史的研究，可說既開拓新領域又是豐收的一年，而開拓者都是才剛畢業一兩年的新科博士，令人欣喜。在上述研究中有三個部分累積過去的研究而有了新看法，如土地改革研究突破過去傳統說法，重新從日治時期的租佃問題至戰後政策的施行，檢討土地改革的得失。其次是日治到戰後大型企業的吸收與重建、技術傳承，已開展出新論述；而利用郊商文書，而得以了解清代郊商的投資與貿易經營型態，亦為重要的研究。不過，清代、荷西時期的研究仍有必要加強，而跨時期的經濟史研究仍不及以政權斷限為準來做的研究，亟待努力。至於研究主題過於瑣碎和缺乏論述的現象，亦令人憂心。

(五)就政治史而言：雖然清代的研究相對地少，卻能在幾已成定論之議題從新切入而有所成，如對治臺政策的探討；日治時期制度史的研究也漸漸有了基礎性的研究，如統治架構、官僚養成及其內在網絡都是詮釋史實漸能較細膩且多層次的分析，跨越了二元對立、統治史 vs 反抗史的好惡判斷與格局。法律史的研究，由法律學者投入，跨越朝代的研究為數不少，且對史料的掌握全面，確實能收到科際整合之效，當然更希望歷史學者對此領域也能積極投入。政治史研究的另一個特色是與現實政治息息相關，亦即為思索臺灣未來如何自存之下所做的學術論辯，日本學者的投入戰後臺灣政治史研究，也是一項特色，其努力獲致的成果，值得我們警惕。

(六)就社會文化史而言：研究的篇章最多，類別也多；教育史方面開發了一些新議題，如航空教育，《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之文本分析，歌仔冊等通俗文學資料的宣傳教育功能等都是；而在史料的使用上也更為多元，如普遍用口

述史或發掘學校資料，以補文獻資料不足。不過，也有些篇章未能爬梳、考訂第一手史料，致論述空泛，且有拾人牙慧之處。在發展新領域上，原住民、職業教育，臺北帝大以外的高等教育，也值得探討。而若能將日治時期的教育史置於「帝國史」的框架，並與各殖民地的教育政策做比較，相信對此領域的國際化有相當的助益。

在體育休閒史方面，課題多樣，尤其是各單項球類運動的歷史、角力、運動會，中華臺北的奧運模式，都是好的主題。也談到了射箭運動，以及日治時期觀光旅遊休閒活動，這一向是體育學門學者的專利，「尚少史界人士觸及，是今後努力的方向」。

宗教史、社會階層的研究並不多，且質與量有待加強，特別在跨時代的宗教研究上有待努力，而新史料的發掘與利用自屬持續性的工作。

媒體傳播電影史的研究數量不多，大都為跨學科之作，但能兼多學科之長的並不多見，在研究方法上採用新聞學、傳播學等理論架構，題材亦多樣化，因而在運用上和方法上都比傳統史學來得靈活，但基本史料的掌握不足，則是猶待加強之處。在時代上，較少跨時代的論文，大半偏重戰後，和體育史類似。

家族史的研究其實就是具體而微的臺灣史，除了做單一家族的研究外，應就其分類，找出其共通性，如清代臺灣家族的武質性發展迄日治初期才被日本官方摧毀或收編是相當有意義的成果；而家族史亦不必劃地自限，可以做不同家族的比較研究，甚至擴大到祖公會、家族、宗親會等研究；而研究原住民、平埔族，戰後來臺外省人的家族史也必須加強，再者家族史不是隱惡揚善，只探討強房的歷史，這是今後必須注意的書寫角度。

建築史的研究——如過去著重在建築型態，但在空間形態比較分析上，已開始加入大量歷史文化資料來論述該型態出現之原因，為少數兼具文化深度及建築專業的論文，亦即往後建築史的研究都能立基於臺灣史的基礎上發展，未來若能由生活史的角度看空間，或研究結合人文所形成之景觀，也將成為未來研究的新領域。

區域史研究過去是臺灣史研究的顯學，但本年的議題未見集中，難以看出研究趨勢與重點，而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有 15 篇（共 35 篇）出自碩、博士生；由於

《文獻類目》未收集各縣市政府舉辦的地方學研討會論文，只有被收入的「臺北學」論文有一些數量，無法真正展現區域史研究的總貌。不過，臺灣南部的區域史研究向來相對於北、中、東區顯得薄弱，希望南部的成功大學歷史系，新設的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研究所能「負起責任」，至於花蓮縣文化局開始舉辦「花蓮學學術研討會」，已有急起直追之勢。

醫療史的研究是現階段最容易與國際接軌的研究領域，由於此領域非有跨學科的訓練不可，因此有賴更多人力的投入和在學科界線上保持彈性。在醫療史的領域上，不論就殖民現代性的角度或持科技醫療與社會研究的觀點，都必須植基於其特定時間之中的社會文化脈絡。至於跨時代、跨地域的縱、橫軸比較，也是此領域的研究不可或缺之手段。

原住民史不論由遺址，企圖將臺灣的史前與歷史時代做接合的工作，考訂族群的類別、社址，研究「熟番、日治理番事務」都是過去議題的持續，清代南部熟番（平埔族）間的移動過程是今年較有特色的研究。至於由法律、政策面來看戰後政府對原住民的政策，將會是往後研究的重點，值得注意的是日治法院檔案，花蓮地院所收藏日治時期關於原住民刑事判決原本，若能妥善利用，將會擴展原住民史的研究。不過以原住民身分投入原住民史研究的還不多見，希望原住民籍博碩士能加入此一研究行列。

文學史是臺灣史研究中新型且有一飛沖天之勢的學門，在階段性的研究已有亮麗的成績，之所以如此，即有外文、中文出身的學者，大膽、大量引進西方理論，研究方法和議題，使詮釋呈多角度，而且中文、臺文系的師生總合可能有5、6倍於歷史學的人數，因此創造力也很可觀；但當由後殖民理論、邁向對現代性，東亞詮釋框架的關注之際，如何擴充、深化文學研究的議題，如何培養下一代具有跨界、跨國研究的實力，是當務之急！

音樂、劇曲研究上，歌謠、戲曲（歌仔戲）等作曲家，都是研究的對象，也都能利用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做為分析概念，且不再只探討戲曲、歌謠的內部，而亦能就外部要素下手，於是藝術活動的外緣生態就成為此類研究的新興話題。

美術史的研究雖被評為使用方法上略顯遲滯，但對清代臺灣美術的溯源，已有了初步成果，亦即由江浙到閩習到臺風，似乎已成為一條美術傳承的路徑。畫

家的畫風表現仍是美術史重要的部分，儘管主題不同，但盼各篇作品都能用臺灣做為觀察角度去思考其主體位置與自我特色。

女性史的議題中，女性閱讀是可更進一步開發的議題，女性作品的賞析乃至於歸納出特色，是往後研究之方向。至於女性研究與女性主義之間的關係，有必要繼續開發，並避免女性主義的運用陷入「政治正確」單一角度的死胡同。

五、結 論

誠如張隆志〈婆娑之洋、美麗之島：2007 年臺灣史通論及史料研究成果評介〉一文所論，臺灣史研究的多元發展，雖能反映出歷史知識民主化的趨勢，但亦出現政治工具化、作品庸俗化及研究瑣碎化等現象和危機。面對來自島內、兩岸及國際學術及政治的多重挑戰，以及當代臺灣國族建構、後殖民差異、轉型正義及全球化等現實及理論課題，學院的本土研究者如何建立對於當代史學思潮及研究取向的基本認識，並從比較的歷史的視野，反省臺灣史研究現有成果及未來方向。進而維持臺灣史作為獨立學術領域的尊嚴和動力，並以專業知識參與公共論述及民主教育，提供讀者嶄新的歷史敘事與思維方式，將是本土史學未來能否茁壯發展的重要關鍵。

2007 年度的臺灣史，史觀上雖仍有對立，但以臺灣的立場看臺灣史則已是大勢所趨，不過在大環境上，會在西方列強競逐下看荷西時期的臺灣史，而後在大清帝國、日本帝國下處理臺灣問題，戰後會在國際資本主義經濟垂直體系下，反共、冷戰體制下看臺灣，而不能抱殘守缺。運用西方理論為利器來深化歷史研究亦為研究趨勢之一，但不能為配合理論而對史料的使用失去客觀性，且忘卻了史家最重要的技藝考訂。在研究主題來說經濟史方面、制度史方面的基礎性研究有待加強，在斷代史方面，則清代臺灣史的研究極需「復興」；盼望荷西時期的研究會因西文、荷文史料的整理與中譯，而能吸引更多年輕人投入此一時段的研究；更希望新史料的整理、刊布能持續進行，有益於新主題的開創。而如何培養年輕一輩具有解析史料及跨國際研究的能力及視野，是三個臺灣史研究所必須負起的重責大任。

引用書目

- J. J. A. M. Kueper (著)、查忻 (中譯)
2007 〈荷蘭改革家臺灣教會殖民背景下的宗教 1627-1662〉,《臺灣文獻》58(1): 1-53。
- MacMillan, Hugh
2007 〈譯介《海外建造家：紀念臺灣的吳威廉 (William Gauld)》〉,《臺北文獻》160: 147-188。
- 石萬壽
1985 〈臺灣南部平埔族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思與言》23(1): 93-107。
- 余昌蓬
2009 〈學位論文視野下的臺灣史研究：以《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2004-2007 年度)為中心的討論〉。(未刊稿)
- 吳文星
2001 〈近五十年來關於日治時期之歷史研究與人才培育(1945-2000):以歷史研究所為中心〉,《臺灣史研究》8(1): 163-178。
- 李筱峰
1984 〈近三十年來臺灣地區大學歷史研究所中有關臺灣史研究成果之分析〉,《臺灣風物》34(2): 84-97。
- 林玉茹
2007 《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林玉茹、李毓中 (著),高明士 (主編)
2004 《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第七冊。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林修澈
2007 《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南庄事件：根據臺灣總督府檔案的理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施志汶
1994 〈「臺灣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國內各校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為中心(1983-1992)〉,《臺灣師大歷史學報》22: 413-446。
2003 〈近十年歷史研究所臺灣史碩士論文之考察(1993-2002)〉,《臺灣史料研究》21: 54-87。
- 張克輝
2007 《啊！謝雪紅》。臺北：愛鄉出版社。
- 張炎憲
1985 〈日據時代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思與言》23(1): 61-90。
- 張靜宜
2007 《戰時體制下臺灣特用作物增產政策之研究(1934-1944)》。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曹永和

1985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思與言》23(1): 3-17。

許雪姬

1985 〈清代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制度史為例〉，《思與言》23(1): 25-36。

許毓良

2008 「表一：2007 年清代臺灣方志彙刊出版書目」。(未刊稿)

陳明忠、陳敏鳳、郭承啟

2007 《二二八的另一個角落》。臺北：愛鄉出版社。

陳鸞鳳

2007 《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神社的空間特性》。臺北：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彭明輝

2002 〈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取向：一個計量史學的分析(1945-2000)〉，收於同氏著，《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頁 151-202。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黃秀政

1985 〈臺灣武裝抗日運動：研究與史料〉，《思與言》23(1): 37-59。

黃富三

1985 〈清代臺灣土地開發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思與言》23(1): 18-24。

楊振隆（編）

2007 《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權與轉型正義學術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葉高樹

2008 〈最近十年(1998-2008 年)臺灣清史研究的動向〉，《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0: 137-193。

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編輯小組（編輯）

2008 《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07 年度》。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蔡石山（著），曾士榮、陳進盛（譯），許雪姬（校訂）

2007 《李登輝與臺灣的國家認同》。臺北：前衛出版社。

蔡淵黎

1985 〈光復後臺灣地區有關清代臺灣社會史研究的檢討〉，《思與言》23(1): 71-92。

藍博洲

2007 《二二八野百合》。臺北：愛鄉出版社。

2007 《青春戰鬥曲：二二八之後的臺北學運》。臺北：愛鄉出版社。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2007: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Hsueh-chi Hsu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in 2004, the Annual Bibliography of Taiwan History has been published with the aim to provide timely information on publications and an integrated bibliography of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he preceding year, thus establishing a tradition of cumulative and yearly academic review on past studies in Taiwan history.

Focusing mainly on the “2007 Conference on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end in research on Taiwan history in 2007, beginning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research efforts in four main categories: General Works, Economics, Politics and Social Culture, followed by an overall discussion on the results obtained, and finally ending with prospects for future historical studies.

While the past year has seen diverse development in research on Taiwan history, a basic understanding on the trend of thought and direction of research concerning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have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 reflecting on current results and future direction for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dual emphasis on academic independence and professionalism in historical recount and way of thinking is the key to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n Taiwan historiography.

Keywords: Taiwan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s, Biographies, Economics, Politics, Social Culture, Retrospect, Prospect